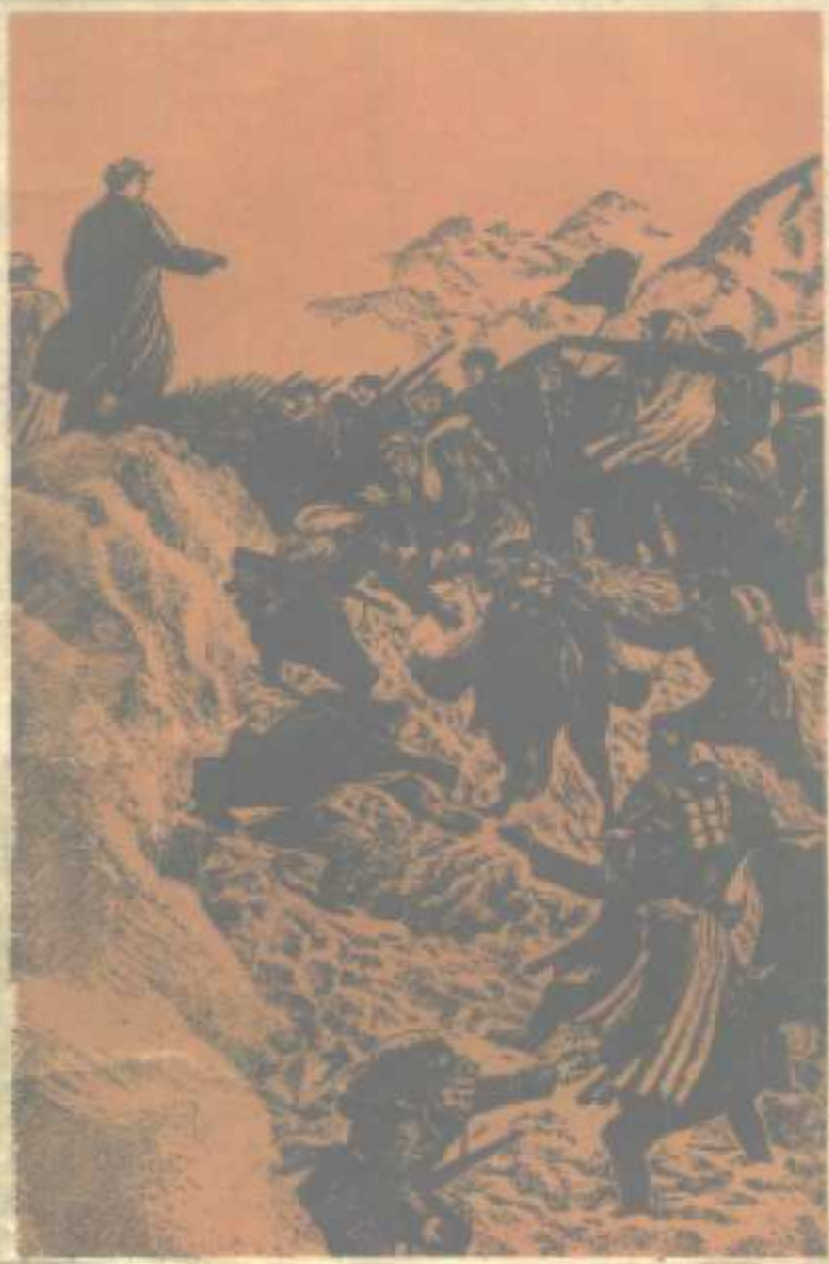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昌奉



2 026 3604 0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 昌 奉

插图：阿 光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本书原在 1958 年出版。这次再版时增加了若干篇章。作者陈昌奉同志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上校。在 1930 年到 1936 年这几年来间，他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经历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本回忆录里，他以朴素生动的文字，描绘出了长征前后毛泽东同志以及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生活侧面，对我们了解当时的革命史实，以及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刻苦朴实的生活作风，都有巨大意义。

跟随毛主席长征

书号 1018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字数 5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1/16 插页 12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1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1961 年 3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

印数 450,001—500,000 册 定价 (1) 0.29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毛主席和陈昌奉上校亲切地谈话

新华社记者 侯 波摄

目 次

一	最初的日子.....	1
二	关于“家”.....	10
三	踏上长征第一步.....	18
四	过苗族区.....	23
五	乌江边上的新年.....	31
六	金沙江畔.....	37
七	彝族人民欢迎毛主席.....	41
八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46
九	向水子地前进的路上.....	52
一〇	雪山草地间.....	55
一一	六盘山上.....	74
一二	我们到了家了!	78
一三	主席送我入学.....	84
一四	辞别主席到前线去.....	91

一 最初的日子

一九一五年秋，我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一个名叫岭脑村的庄子里。家里很穷，十一岁死去母亲，父亲靠给地主扛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贫穷，又遭受过地主、土豪的迫害，我打从小时候起，就从心眼里痛恨那些吃人的剥削阶级。

一九二八年，田头王坊村中忽然飞传着有一支红色的队伍，像是从天上降下，穿过宁都直往瑞金、大柏地挺进。这一新鲜传说，波动了全村所有的人；越传越广，越说越神奇。穷人们听了就高兴，他们说，那是搭救穷人的队伍，名叫“共产党”、“红军”，专门“杀富济贫”，把地主、土豪的金银财宝撒在街上，让穷人自己拿；富人们听了就害怕，他们把这支队伍描写得很怕人。我那时只有十三、四岁，虽然还不懂事，可立刻就相信了穷人们的说法。“杀富济贫”这四个字，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我的脑子里。

又过了不多日子，村中一些跑外的小贩，打从福建长汀一带回来，他们个个都兴高彩烈地谈论着新鲜见闻；他们说，长汀被红军拿到手了，他们在那里斗地主，打土豪，

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田，伸直了腰干，扬眉吐气了。我一听心里可乐了，成天价盼望着这批穷人的队伍有一天会到自己的村中来。

这一年的新年，我的家因欠土豪的钱被抄了。家里的东西，从野外的一小块土地到屋里盖的破被子，都被抢走。幸亏邻居们说情，才留下一口做饭的破铁锅。日子更艰难了，从此我就给人家放牛。那时的日子，真是连牛马也不如，牛马干完了活儿还能吃上草料，可我们一家子连一碗稠一点的稀饭也喝不上。怎么办呢？“找红军去！”——这想法也不知什么时候从脑子里钻了出来，越想越坚决。过完了春节，农历正月初二的那天黑夜，就和同村一个姓温的青年，背着家人偷偷地离开了故乡，直奔福建长汀，毅然决然地找红军去了。

不知走了多少天和多少路，也没碰到一个红军，虽然饿着肚子，决心可没动摇。走到了离长汀还有十五里的一个山岗上，我们一眼看到两个帽带红星帽徽的军人在那里站岗，“这一定是红军！”我和那姓温的立刻跑上前去，问明了之后就高声说：“我们是来当红军的！”那两个同志详细地盘问了我们之后，就指着长汀说：“那里有‘扩红队’（即扩大红军宣传队）。”要我们到那里去报名。

到了长汀，在一座大石桥上，果然碰见了“扩红队”，可把我们高兴死了，不容分说就要参加，可没想到他们端详了我半天，摇摇头，说我年龄太小，扛不动枪，不能收留。唉！为了这一点，我还哭过呢！我大声地说：“我非当红

軍不可，不让我参加我就不走！”他們看我那么坚决，终于軟了下来，从此，我就当上了光荣的紅軍。

參軍后，我被分配在中国工农紅軍第四軍（朱德同志是四軍軍长）軍部副官处当号兵，不久，又調为勤务員。

一九三〇年的三月底，我們軍部駐在江西永丰县的白沙村。一天中午，副官处的刘振庭副官把我叫去，說要調动我的工作。我問他：“調动什么工作呀？”——当时“調动工作”四个字，对我來說还很陌生呢。

刘副官說：“調动工作，就是要你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說罢，两眼端詳着我，似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能馬上告訴我。

“去哪？”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在这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調动工作呢？

“罷你到前委去，給毛委員当勤务員。”刘副官說完，滿面笑容地望着我。

“前委”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員會的簡称，这我知道。可这位毛委員是誰，我就不清楚了。不用說，他是个首长，不然怎么能够有勤务員呢？可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脾气好不好呢？

刘副官见我犹疑不定，大約猜透了我的心事，走到我面前来，双手扳着我的肩膀說：“小鬼，你應該高兴，那位毛委員是再好不过的人啦，你跟着他，将来一定很有出息。”他說完就給我开介紹信，让我整理东西，准备去“前委”。那时行装很簡單，連被子带衣服加起来不过三斤重。

“前委”和我們住一個村，不一會就到了。

到了“前委”，一位个子挺高的同志領我去見主席。我心里很緊張。一边走一边想：这毛委員什么样？是不是和我們軍长一样，粗粗的眉毛，滿臉大胡子……院子挺小，想着想着就到了主席的房子。主席住的是江西那种小樓式的木房子，一共兩間，一間是宿舍，一間是辦公室。我們从宿舍門进去，一打眼就看見一張普普通通的木板床，上面鋪着一條洋布被單，連个枕头也沒有。我緊張的心一下子松开了，心想：看这房間的布置，这人和我們差不多。走进辦公室，見有兩個人正在談話。領我来的那位同志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一个人說：“那就是毛委員。”

我向前走了一步，好奇地望着这个人：他穿了一身和我們一样的灰色軍装，和我們不同的是他那軍装的口袋似乎特別大。沒戴帽子，留一头烏黑的長发。不知因为他头发特別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臉显得特別白。也許因为太瘦了一点，一双眼睛显得又大又有神气。看样頂多有四十岁。他正在用手比划着和对面一个人談着什么。声音挺柔和。談的什么我虽然听不明白，但却覺得十分亲切。不一会，对面那个人站起来，他也站了起来。我这才发现他的个子很高大。

等那人退出去之后，領我来的同志把我引到他面前說：“毛委員，給您調来了个勤务員。”他轉身指了指我。

我虽然心里有点拘束，但在軍部学的一套礼节還沒疏忽，赶忙上前打了一个敬礼說：“报告！”

主席望着我笑了笑——他笑得是那样慈祥、温和。这
一笑把我原有的拘束一扫净光了。

“你姓什么？”主席問。

“姓陈！”我大声回答。

“叫什么名字？”

“陈昌奉！”

“陈昌奉！”主席慢慢地說：“十几啦？”

“十六岁！”这时我回答的声音自然一些了。

“为什么当紅軍呀？”主席像老师考問小学生似地問
我。

“紅軍好，打土豪！”我还是立正站着。

主席指着一把椅子，示意让我坐下。很有兴致地問
我：“你們家乡有土豪嗎？”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我說着，就把我的家
庭情况和怎么参加紅軍的事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我发
現主席很注意听我讲，不时地点点头并微微发笑。这給
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很好，一点也不拘
束，所以話說得特別多。直到領我来的那位同志在后边
用手戳了我一下，才发觉自己說得太多了，有些不好意思。

“很好！”主席对我說：“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
学习。”他停了一下又問：“你能写下自己的名字嗎？”

我站起来，揉搓着自己的衣角，帽舌头下的用双眼偷
偷地望着主席，小声地說：“我沒念过书，不会写字。”停了

一下又馬上補充似地說：“您寫了，我會認的。”

主席笑着站起來，走到我的身邊說：“以後要學會寫，要會寫自己的名字，也會寫許多人的名字，願意嗎？”

“願意！”我低聲回答。

主席轉過身去，對那位帶我來的同志說：“這是新同志，你們要好好地幫助他！”隨後又轉過臉來對我說：“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問他們。”

我跟着領我來的同志剛下樓來，他就拉着我說：“你怎么說起來沒有頭了？”

“我……”我覺得我說得不多，好多話還沒有對他說完呢！

“你知道他有多忙嗎？”

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他可忙啦！”他說：“你要記住，在他看文件的時候，可不要吵，不要弄得滿處亂响。還有，他每天晚上總要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的早飯要晚一點打。懂嗎？”

“懂了！”我高興極了。當天晚上興奮得一宿沒睡好。

第二天早上醒來，同屋的同志都問我夜里作了什么好夢，連說連笑。我朝他們做了個鬼臉，提起小木桶打洗臉水去了。

“干什么去？”還是昨天帶我見主席的那位同志問我。

我理直氣壯地說：“給毛委員打洗臉水呀！”

“你看！”他顯出生氣的样子說：“不是告訴你了嘛！毛委員睡得晚，不要弄醒他吧。”

我放下木桶，知錯地笑了。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早上打了水，輕輕地提到樓上，我自己就坐在小樓門口的一個小吊椅上，靜靜地等着主席的吩咐。可主席却很少叫我，就這樣一連坐了好幾天。

有一天，主席洗了臉就問我：“陳昌奉，你怎么老坐在那里不动呀？”

我扶着搖晃的小吊椅說：“怕您有事，找不到我。”

主席笑了笑，象对孩子似地說：“以后不要光坐在那里了，有空就去和大家一块学习。我没有更多的事要你做。”

那时差不多天天要打仗，到处流动，在一个地方頂多住个把月。主席的生活很簡單，很快我就摸熟了他的生活习惯。那时主席的全部行装是：两床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軍服，一件銀灰色的毛衣。用的东西是：一把破雨傘，一个吃飯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等，全部装在这个挂包里。每当行軍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傘，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到了宿營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鋪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臥鋪。

主席晚上睡覺很少，吃过晚飯便点上小灯（这是一个小馬灯，行軍时做路灯，住下便用磚头垫起来办公用），打开那个九层的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紙、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有名的“查田运动”，就是从那时

开始写的。

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睡来。每当主席推醒我时，我们俩就都笑了。于是主席就叫我去休息。

夏天，常常在半夜时分，他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一次，我把他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他便问：“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我照实说了，他批评我说：“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下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那时整天行军作战，主席有时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我心里很着急，总想给他搞一个暖水瓶。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地方，得到了战利品，主席不是把送给他的东西给战士同志，便是送到医院里去给负伤的同志，自己从来不要。一九三一年冬天，我们打开了江西吉安，我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了个搪磁暖水瓶，心里虽然高兴，可又怕主席知道，一行军，我就把它交给别人带着，以防备主席发现。有了这个暖水瓶，喝水不成问题了，可吃饭还

是不方便。那个小缸子盛夜餐还可以，一行起军来就不行了。有时候打一仗我们就走，走到中途大家都休息吃饭了，主席却还是用那个缸子吃“三层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他当选了共和国主席——从那时候起我们对他的称呼才从毛委员改成毛主席——但他那时吃饭还只用一个小缸子，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打开福建漳州，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瓷饭盒。我高兴极了。提着饭盒，抱着“保密”的暖水瓶走到主席面前说：“主席，您看我们什么都有了。”

二 关于“家”

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县城或集镇，主席时常派人或亲自领着我们先去敌人的县（镇）政府，找敌人的档案文件，再去当地的邮局，买报纸和杂志。往往我们空着手跟他出去，转一圈回来，每个人都背一大捆书报回来。当天晚上主席用红笔划出记号，我们便照着剪下保存起来。

一天，我们到了江西的信丰县。这地方过去我们来过几次，老百姓都知道红军好。虽然也是经过战斗才进来的，可老百姓一个也没有跑。街面上的商店都开着门，好多老百姓都出来欢迎我们。

刚住下，主席便对我说：“陈昌奉，走！到邮局去！”

我跟着主席往邮局走去。信丰这地方虽然不怎么样，街面倒还繁华。红军这一到，街上就更加热闹。三个一堆五个一簇的人，在太阳底下聊天。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围着一个战士，他正指手划脚地给他们讲些什么。正走着，忽然碰上了我们的司务长，他手里提着一大块牛肉。我连忙拦住他轻轻地說：“司务长，给我们留点！”司务长点点头，然后戳了我一下說：“首长哪？”我抬头一看，主席已经走出好远，快到邮局了。我朝司务长伸了伸舌头追

了上去。

邮局，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个贩卖书报的商店，至于别的，当时我是不怎么清楚的。

到了邮局，主席开始在一大堆书报里翻着，不时挑出几本书、几张报递给我。

付好钱以后，我一边整理着书报一边问主席：“主席，这邮局都管着些什么？”

“邮局管得可多啦！”主席对我解释说：“送报、送信、打电报、打电话都要他们。你要是给家里写信，它就会给你送去。”

“我给家里写信它也能送到？”从邮局出来，一路上就想这件事。这可太好了！算算我离家也有二、三年了，家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呢？父亲还在吗？他怎么活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一下子涌到脑子里翻腾起来。要是能给家里写个信该有多好呀！

回到宿营地，天已晚了。放下书报，给主席点上灯，他就开始翻阅起来。按时间我该给主席打饭去了，可由于“邮局问题”，搞得我脑子里挺乱，光想着这件事，竟站在主席面前发呆了。

“怎么啦？”主席看我神色不对头便问道。

“主席，”我说：“我家的信，它也能送到吗？”我把“我”和“它”说得特别重。

“谁呀？”主席问。

“邮局！”

“能！你家也是苏区了！”主席了解了我的問題，接着說：“想給家写信了嗎？”

我点点头。一面走上前去輕輕地說：“主席，我想給家里写封信，可是……”

“写不来！”沒等我說完主席便接上說：“来，我給你写。”

一听主席要給我写家信，可把我乐坏了！可又一想，主席这样忙，还要就誤他的時間，心里有点不安。我正为难，就听主席說：

“你想告訴你父亲些什么？”說着就推开报纸，拿出信紙来。

“我……”是呀！我对父亲說些什么呢？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了。我說：“主席，你看着写吧！反正談我在紅軍里好，跟着您好，很好很好就是了！”主席又問过了我家的詳細地址和我父亲的名字，我就打飯去了。等我打飯回来，看見主席一手托着腮，一手拿着笔在思考着什么。我知道，这时請他吃飯是不合时宜的，便把飯盒子輕輕地放下走了出去。

我躺在松軟的稻草鋪上，覺得全身热得很，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着我自己，想着主席。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当了共和国主席的警卫員（那时我已由勤务員改为警卫員）；現在居然由主席亲自給我写家信，几年来，主席对我各方面——从生活到学习，一直象慈父般地关怀，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恩师呵！

就这样想呵，想呵，眼泪竟不由人地顺着两颊滴在稻草上。夜深了的时候，我又跑了出去，望见主席屋里的灯还亮着，他还在工作呢！那一夜我没有睡好。

第二天上午，我端着饭走进主席的办公室，他拿着那早已写好的信，交给我说：“信写好了，你看行不行？”

我连忙放下饭盒，双手接过信来，惶惑地说：“行！这还能不行！”

“快送邮局发走吧！”主席催促着我。

“您在吃饭哪！”

“不要紧，快去吧！”

我突然敬了个礼，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出了主席的办公室。

回来后，主席望着我说：“这可放心了吧！还想家吗？”

我傻笑了一会说：“不想了！您叫我回家，我还不回去啊！”

一九三三年秋天，部队攻打建昌府的时候，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到了广昌。广昌这地方离我的家乡宁都已经比较近了，回家看看的念头一下子冒出来了。到达广昌的第一天，我便对主席说：“主席，到广昌府我可熟了，要是回家看看，我可认得路呐！”

主席朝我微微一笑说：“不要着急，慢一点嘛，越走离你们家越近。”

“真的！”我大声地说出这两个字，高兴得心都要跳出

来了。

两三天以后，我就跟着主席到达了我久别的家乡——宁都县，到达宁都是下午两点钟左右。主席就住在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那里。一住下，主席就把我叫去，拍着我的头说：“想回家不？”

“……想。”

“好！”主席说：“这几天我在这里开会，你回家看看。”主席说着停下来，望着我问道：“要多少天？”

主席一说让我回家，我脑门里轰地一下热了起来。他这一问，我一时无从回答。于是主席伸出了一双大手说：“十天，怎么样？”

我说：“好！”说罢就想走。但当我刚要挪动脚步时，陡然想到我回家之后主席吃饭、喝水谁来照顾呢？“不，主席，我不回去了！”我说。

“怎么啦？”主席好奇地望着我。

我说：“我回家您吃饭、喝水怎么办？”

主席笑着走到我的面前，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慈爱地说：“去吧！回家看看，回来工作就更有劲儿。你们家也是苏区了嘛！”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来不要到宁都来找我，直接到长汀去，我在那里。”

我点点头，还是不想走，心里矛盾得很，老觉得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好，很不放心似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一直很激动。家……主席……主席……家……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夕阳下，沿途的

稻田花一样的美丽。家，我的家也变成苏区了。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苏区再好的地方！又想到主席，他真是穷苦人的伟大领袖，世界上还有比他再好的人么！

到达我们村头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眼前横着一条小河，这就是幼年时代我放牛的地方。抬头望去，我出生的岭脑村静静地躺在河对岸，稀稀的灯火有如夕阳初下时的繁星。

河岸上等摆渡船的人很多，我也随着大伙登上了渡船。在二十多个庄稼人中间，我的装束是很显眼的，身上穿着军装，背着匣子枪，老乡们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在嘁嘁喳喳地说些什么。

“老表！”^①我开腔了：“你们村有个叫陈秦祥的吧？”陈秦祥是我父亲的名字。

一说出这名字，船上的人都不吱声了。不知怎么，一霎时，我的心绷紧了。

“有个陈秦祥！”

“你是××！”一个中年男子叫出我的小名。

“是呀！是我！”我高兴起来，碰上熟人了！要不是在船上，我真要跳起来了。

这一下，船上可活跃了，你一言我一语，都争着告诉我，家乡现在也红了，地主土豪被打倒了；也平分了田地，我父亲也分到了土地……

^① 江西人称老乡为老表。

“哎！”叫我名字的那个中年人說：“你父亲打从見了你的信，整天盼你……”

“信收到了？”我忙打斷他問。

“收到了，早就收到了。”

說着說着，不一会就到了对岸。

一下船，大伙儿你拥我推地把我送到家里。当天晚上，我家就像开群众大会，乡亲们都来了，村苏維埃主席也跑来了。大家都要我讲述紅軍的情况，我父亲坐在一旁笑眯眯地，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称心。

当大伙儿听說我是給毛主席当警卫員时，兴趣更高了，一定要我讲关于主席的事。我說：“主席和咱們老百姓一样。”他們听了不滿意，非要詳詳細細讲个明白才行。那一夜，我們一直扯到鸡叫了两遍为止。

在家住了八天，我就到长汀找主席去了。一到就听說主席进了中央护士医院休养，把我吓了一跳，难道主席生病了嗎？我什么沒顾得就跑到医院，看到主席身体还好，才放下了心。

主席見我回来了，也很愉快。我把我父亲让我帶給主席的花生、地瓜拿給他；他笑着接了过去，一面关切地問：“你們家好嗎？”

“可好啦！”我止不住自己的兴奋，告訴主席：“家乡成立了苏維埃，地主、土豪都打倒了，我家还分了三間房子，十六亩地！”

主席点点头，說：“很好。”又問我：“你們村苏維埃主

席是穷人还是有錢的人呀？”

我說：“穷人。从前和我們家一样地受苦。”

主席又問了我一些家乡情况，最后打趣地同时很关怀地說：

“你父亲給你找到媽媽了吧？”主席的記憶力真好，那还是我刚到他身边的时候，曾告訴过他我没有媽媽。

“找着了。邻居对我說，还是苏維埃式的自由結婚哪！”

主席哈哈地大笑了。

三 踏上长征第一步

一九三四年初夏，主席在沙洲壩主持了財政經濟會議后，便到了当时中央苏区的生产模范区——瑞金县的武阳鎮，做农村調查去了。又从武阳鎮到了粵、贛省委所在地会昌县。在会昌住了一些时候，又到了雩都。八月間才从雩都回到駐地——瑞金附近的高鼻礪。这几个月来，主席每到一处，不是召集当地負責干部开会，就是下乡調查，忙得很。

回到高鼻礪，正是敌人第五次“圍剿”最緊張的时候。敌人疯狂得很，飞机整天不断地在头上乱轉，不时投下炸弹，无目标地扫射着。局势很緊張。

主席在那些日子，更忙了，他和謝覺哉同志住在一座小山上的大庙里。白天要下山跑二三里地去軍委开会，晚上就連夜写东西，經常写到深夜。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連夜送下山去給周恩来副主席他們看。直到这些东西用紅綠紙印成小册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有关游击战的战术問題。我們住的这座小山，整天来往的人群不絕。主席那时的身体又很不健康，經常不吃飯，晚上又失眠，眼看着他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我們警卫班的同

志都为他担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每当我们去劝他休息的时候，他总是指着办公桌上的文件用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我看完这些文件就休息，好吗？”可是这些文件永远像大江流水一样地不断头，哪能看完呵！长此下去那怎么行呢？于是我们向中央总务处袁福清处长建议，给他调一位大夫来。

一天下午，刚吃罢晚饭，主席站在大衙门的台阶上，好像是在想什么事情，袁福清处长和中央医院的傅连璋同志来了。一看见他们俩，我心里就乐了：这一定是来商量给主席调大夫的事了！那时我听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身体一不好就得听大夫的话。

主席和袁处长他们握过手就谈了起来，我也站在一旁，心想到了“紧要关头”，也好加上个一句半句的，给主席请个好医生。

一开始，袁处长谈的是给主席配备饲养员的事。可是大夫呢？我有点着急了！谈了好大一会之后，袁处长才说：

“主席，给您配备了一个不错的医生，跟您一起走吧？”

我一听，差一点跳了起来，心想：这一回可好了！嘴里不觉得就说了出来：“对！快给主席派来吧！”说完了，又觉得不该在首长们面前这样说话，倒不好意思起来。

主席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袁处长他们。燃起一支烟，慢慢地说：“我看不要大夫了吧，派个能试试体温、打打针的护士就可以了……”

“主席，”袁处长沒等主席說完，接上去說：“根据你的身体情况，还是派个大夫来好，何况已經找……”

“不！”主席也打断了他的話：“現在部队需要大夫；我們的大夫又少，我自己怎么好占用一个大夫呢！”他笑了笑：“我的身体还不错，有个看护不就可以了嗎？”

袁处长和傅連璋同志还想說些什么，但他們知道主席的脾气，沒有再坚持，就无可奈何地走了。

过了几天，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背着一个紅十字挂包到我們这里来了。他就是长征途中一直跟着主席的卫生員鍾福昌同志。

这时候，我們根据主席的指示，开始輕装，准备上前綫（当时并不知道要远征到陝北）。我們警卫班的同志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一次輕装那么严格，連主席用了好几年的一個九层挂包也留下了。主席的全部行装是：两条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一块油布，一把破伞和一个书挑子。

“要到前綫打仗去了！”同志們都兴奋地談論着。

九月底，我們便跟着主席离开高鼻碛，又到了零都。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八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就在这天下午五点多钟，我們二十几个人跟着主席离开零都，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

走出零都北門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順着河水往上走去。滾滾的河水帶着黄色的泡沫翻騰着，大声地发出呼嘯，像吹起了进軍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風一陣一陣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沒有穿

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軍裝，戴一頂八角紅軍帽。他邁着大步，帶領我們前進。

在離開零都二十多里的地方，前邊傳來了隱隱的叫喊聲，並看見閃爍不定的火光。我和衛生員鍾福昌同志不知前面發生了什么事，很為驚疑。

主席說：“那是我們的隊伍！”

“我們的隊伍？”我想：“在零都出發時一個兵都沒看見，可這裡怎麼突然出來我們這麼多隊伍呢？”我心里很納悶。

到了河邊，只見兩岸的紅軍人山人海，無數的火把宛如千萬條火龍；歌聲、歡笑聲和前後聯絡的叫喊聲混成一片。寬大的河面架着一座用船搭成的浮橋，部隊川流不息地在行進。

“主席！咱怎麼有這麼多隊伍呀？”我高興極了，跑到主席跟前大聲地問。

主席笑了笑，輕輕地對我說：“這還多嗎？前面還有很多很多哪！”

我們跟主席走上浮橋。橋上擁擠着騎馬的、步行的、挑担的人和送別紅軍的老百姓，主席不時地停下來，等候別人過去他再走。

半夜時分，從對面來了抬着傷員的担架。老鄉們興奮地告訴我們：

“古陂、新田快打下來了！”

主席走過來了，他在担架旁停了下來，把傷員身上的

夹被往上拉了拉，輕輕地問道：“同志，你的伤重嗎？”

伤员借着火把的光亮呆呆地望着主席，很激动地說：“不，不重！我很快就可以上前綫！”

担架过去了，主席望着伤员像是在沉思什么。

天将拂曉，从我們前面过来了很多老百姓，他們差不多每个人都扛着一个沉重的布袋。

“老表！”我上前問道：“你們从哪里来？”

“古陂、新田打下来了！”他們差不多是齐声回答。

“你們扛的什么呀？”我問。

“盐！这是最好的东西哟！”

哦！原来他們是打从老苏区来的向导，这些盐是从古陂、新田带回去的。那时，苏区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也举手和他們打招呼，并且說：“这回你們可不愁沒盐吃了！”

天亮了。大道两旁数不清的人群，来来往往。沿村的墙上、树上，到处貼滿了标語、捷报：

“我軍攻下古陂、新田！”

“庆祝第一个大胜利！”

四 过苗族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間，紅軍突破了湘江大水——长征以来敌人的第四道封鎖綫，到达了广西、湖南两省交界的一条大公路上。由于敌机白天疯狂得很，主席和我們大都在夜晚行軍。到达这条公路的时候，什么也看不清，心里只觉得是在順着公路走，天拂曉时，才发现来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山村里。

連續行軍作战，主席沒有好好地吃过东西，队伍一停下来，我就和同班的小曾同志去找吃的。因为山村小，老百姓又都很穷苦，跑遍全村只买到二十几斤地瓜。当我们用广西那种很大、很深的沙鍋把地瓜煮好，抬到主席屋里的时候，只見主席坐在一个小木凳上，向围在他身边的警卫員、飼养員讲些什么。我只听见一句：“突破湘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是呀！想想夜里过湘水的情景，也确实不容易。

我和小曾抬着沙鍋，喊着：“飯来了！飯来了！”走到主席面前，說：“主席，这里什么也沒有，只有地瓜。”

主席沒有說什么，伸手拿起一个地瓜，吃了一口說：“这地瓜不錯，很甜。”

“和加了糖精似的。”一听就知道是丁良祥說的。不管行軍、作戰，到什麼地方，丁良祥的話就象上滿了弦的唱機一樣，永遠不停。他的性格和他的同行鍾永和恰恰相反，鍾永和在任何情況下總不多說半個字。

這時，我們有的坐下來，有的站着，圍着主席一邊吃，一邊說起話來。

“主席，”還是丁良祥說：“我們夜里怎麼不順着公路上桂林呀！”

“你就知道往大地方跑……”我發現主席要講話，連忙停了下來。

主席說：“咱們要繼續前進，要進入苗族區啦！”

“苗族區！”這可挺新鮮！過去上政治課的時候，指導員曾經講過，說苗族是少數民族，文化和經濟都還落后，風俗習慣也很特別，他們遭受白軍的迫害更重。可到底他們是什麼樣兒，总觉得怪神秘的，这回能够亲临其境地看看，倒是滿有趣味的。

這時主席又繼續說：“他們和我們漢人一樣，也要鬧革命，反抗白軍的壓迫，所以也是我們的好弟兄。”

接着，主席就更具體地給我們講述苗族怎樣遭受白軍的壓迫及他們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等。主席囑咐我們，到了苗區要更好地遵守群眾紀律，一不許到處亂跑亂竄，二不許隨便動人家的東西。又說，他們的婦女也和蘇區不同，蘇區的婦女見了紅軍喊着“紅軍哥哥回來了”，苗區的姐妹可不興這樣稱呼，她們還很封建呢。

經主席这么一說，我們几个跟随主席的人都觉得很犯难。这不是到了“禁区”了嗎？那么到宿营地以后借东西怎么办呢？想到这里，我就对主席說：“主席，下門板可以吗？”因为主席每到一個地方大都睡門板。

“下門板可不行！”主席說罢又笑着問我：“不是不許随便动人家的东西嗎？”

“那您睡什么？”

“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睡人家的門板！”

我心里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不再作声了。心想，苗人的性情一定和汉人不一样，他們一定特別厉害。正想着，不知誰的鼾睡声响了起来，一看是挑担子的黄应和同志。他正躺在主席身边进了梦乡，手里还拿着半块地瓜。

主席看了看黄应和，笑着說：“好了，吃饱了都睡觉吧，晚上还要行軍哪！”

人是躺下了，虽然需要睡眠，但除了黄应和，誰也睡不着。天一亮，敌人的飞机像报丧的大喇叭似地在天空直轉，不时地投下炸彈，把老百姓的房子和稻田炸得一塌糊涂。这些該死的白匪！

我們几个警卫員等躺在地上无事可做，只有請了良祥来給我們讲故事。他的故事永远是新穎的。听到敌机丢炸彈，他馬上就讲一个炸彈的故事；敌机在头上旁轉，他就能讲一只大头蒼蝇，想吃好东西，但又得不到，气得嗡嗡乱叫的故事……这些編造的“故事”，使我們忘掉了敌机，有时甚至能很快地入睡。不过当丁良祥发现我們

都睡了的时候，是很不满意的。他警告我们，如果再这样“不礼貌”，他下次就不讲了。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真是需要休息呀！

.....

夜行军又开始了。

十一月的夜晚是寒冷的。即使是轻微的冷，对我们夜行军的人来说也是无情的。晴朗的天空没有月亮，只有那眨着眼睛的群星陪同我们前进。在沉静的夜里，不时传来前后部队的联络声，和压低了嗓子的叫喊声；偶尔也传来几声烈马的嘶叫，和马夫们抽打它们的鞭子声。至于部队，那是很有秩序的。掉队的人很少。不过有时也看到路上有一些被服和用具，不知是主人无意丢失的，还是为了减轻夜行军的负担而有意丢掉的。

一夜的行军几乎全是围着山腰转。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爬上滑下。有时爬到山顶，猛一抬头就像顶着天一样。每到一個山头，主席总是停下来前后望望，问问我们有没有掉队的，再继续前进。

拂晓时分，我们从一座山上走下来。对面一个不大的山腰中，几幢木房子出现在我们面前。这里的房子很特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说平房不是平房，说楼房又不是楼房，像是吊在半空中的筐子。主席告诉我们，这就是苗族区。

走进山村，太阳升起，薄雾尽散。一幢幢的房子都看清楚了。房子的后墙就是山背，而房子却伸了出来悬在

山中，象是长在山上的样子。房子的下面多是养猪、养羊的场地；窗口下边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潺潺细水，有的还汇成小小的池塘。记得我们在江西打土豪的时候，曾得过一张画，那上面就是画的这个风景。不过那画远不及我们眼前的景色美丽。

主席住的房子看来还很不错，房子窗下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里边还养了不少大头鲤鱼哪！对这个发现，吴洁清（当时主席的警卫员）和我们都异常高兴。

“咱们搞几条鱼给主席吃吃吧？”吴洁清出了这么个主意。当然这是再好没有的了，不过一想起主席昨天给我们讲的话，谁还敢下手呢？

“这家也许是土豪吧？”吴洁清见大伙不言语，进一步“煽动”大家。

“我去问问主席再说吧！”鍾永和同志慢腾腾地提議。

我提着水，到主席的房里去，主席正准备休息。我把水放在一张竹桌上，站了一会，考虑着怎么开口。“主席，您饿了吧？”我终于想出一个主意。

“有吃的吗？”主席问。

“有！”我赶紧接上去。

主席转过脸来望着我问：“有什么吃的？”

我一边倒水，一边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有鱼，很大的鱼！”

“哪里来的鱼？”主席问我。

“那不是！”我指了指窗外的池塘。

主席走到窗前看了看，转过身来很严厉地看着我说：“我昨天给你们讲过的难道这么快就忘记了么？”

我低下头，轻轻地问：“咱们花钱买不行吗？”

“花钱也不行！”

“少买几条不行吗？”我决心作最后一次试探。

主席看透了我的心情，走到我面前坐了下来，又耐心地给我讲了一番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我们的政策。他说：“不管他们养的大羊或者大鱼都不要动。说不定人家是留着敬神的哪！”

吃鱼的希望没有了，原来想的“打土豪”的办法也没敢说，提起水桶往下走去。刚走到门口就听主席叫我：

“陈昌奉，告诉大家，不要动老百姓的东西，有什么吃什么！”

我答应一声：“是！”便走了下来。迎面碰上了吴洁清，看样子他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消息。见我下来，一把把我拉到身边，小声问道：“怎么样？”

我没好气地说：“主席不同意！”

“花钱哪？”

“花钱也不行！”我又对准他的耳朵大声地说：“这是纪律！你懂吗？”说罢我就跑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忽然来了十几个身着汉人便服、带着枪的人要见主席。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走上前去问道：“你们是从哪里来

的？”

不想那些人都很和气，其中有一个人操着一口难懂的广西話对我說：“我們是本地人！”

“本地人？”我想，“本地人就是苗族人了，他們見主席干什么？而且还帶着枪。”我問他們：“你們有手續嗎？”

“有，有！”其中一个彪形大汉从口袋里掏出一張很小的便条交給我。

我拿着走进主席的房間。主席正在看地图，我上前报告：“主席，外边有人要見您。”

“什么样的人？”

“本地人！”我把那張紙条遞給主席，接着說：“还有枪哪！”

主席看罢紙条，抬起头兴奋地对我說：“快去把他們請进来！”說着就往外走，他要亲自迎接那些人呢。

我把这些陌生人請到主席屋子里，就退了出來。不过心里挺納悶：他們是干什么的？主席为什么對他們那么热情？

陌生人在主席屋里停了很長時間，直到太阳落山才走。

他們走后，我把主席的飯端了进去，看見主席还站在地图前，地图上已画滿了一些紅圈圈。我把飯放下輕輕地說：“主席，您吃飯吧！”主席轉过身来，放下手里的鉛笔，微笑着問：“沒有弄人家的魚吧？”

我笑着搖搖頭，一面問主席：“主席，那些人干什么

的？”

“是苗族同志！”主席很高兴地说。

“苗族人也有枪？”我好奇地问。

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他们是苗族的游击队，是我们的同志！”

“苗族人也有我们的同志？”我觉得很惊奇。

“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到处都有共产党！”主席又幽默地加了一句：“光兴你自己革命吗！”

我傻笑了。

当晚，我们又从这里出发了，在路上我偷偷地对吴洁清说：“哎，你知道苗族也有共产党，也有游击队，也有我们的同志哩！”

“真的？”

“怎么不是真的，”我说：“下午来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呢！”

五 烏江邊上的新年

中央紅軍到達貴州黃平縣的時候，正好是一九三四年的歲末。一九三五年的新年來到了。離開江西老蘇區兩個多月以來，一直是作戰、行軍，行軍、作戰，同志們都很疲乏了。聽說要在離黃平不遠的猴場過年，心里可真是說不出的高興。夜晚睡覺也特別香甜。

早上醒來不見紅日，只見幾塊黑色的濃雲被大風推着往一起游動。不一會，風卷雪花往我們脖子里鑽。雪一進去就化了，又涼又痒怪不好受的。不一會落多了，也不覺得怎么樣了。倒是猛往眼皮上飛的雪花最討厭。在這樣長途行軍作戰中，走着睡覺是抓緊時間休息的老辦法，可雪花象是專門和我們作對，尽管我們把帽子拉得很低，它還是一個勁地往眼皮上飛，使你不得安寧。好在黃平離猴場近，我們一會就到了。

猴場是個集鎮，市面很活躍，這是我們離開瑞金以後碰上的比較大的一個地方。

剛到這裡，主席就直接到軍委住的地方開會去了。按照我們警衛班幾個人的分工，今天第一班是我和小曾跟主席到會場，關桂蘭、林育才負責給主席找房子，安排

住处。

太阳快落山了，關桂兰他們才來換我們去吃飯。他一進屋，就蹲在我們燃起的火堆旁，頭也不抬地說：“快，快回去吃飯吧，都給你們準備好了。”

“主席的地方都安排好了？”我問他。

他和林育才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又向我瞟了瞟眼，很神秘地說：“快回去吧，回去就知道了。”我們剛出門，他又跟上來說：“早點帶燈來接主席！”

我到了中央隊的宿營地，覺得情況和往日大不相同，所有的同志都顯得很活潑，他們有的穿著單薄的軍衣在大街上掃雪；有的扛著門板準備搭鋪；還有的在練習唱歌，總之是一片新氣象。我打聽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原來同志們都在準備過年，而且晚上還要舉行新年晚會，有各種表演節目呢！這可把我樂壞了，幾天行軍的疲乏，一下子化為烏有，象天上飛著的雪花，早不知飄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立刻加快了腳步，拉着小曾同志說：“走！咱們快回去看看布置得怎樣，主席一回來，好歡歡樂樂地過個年。”

給主席安排的住屋，是一家四合大院，一進門，迎面堆了兩個大雪人，很威武，用磚砌成的天井走道，干淨得象用水洗過。主席住北屋，共三大間房子，敞敞亮亮的，當中的一間是會客室，頭頂上吊著一盞煤油燈，屋正面靠牆擺著一條古色古香的茶几，前面是八仙桌，兩邊擺著太師椅子，迎門牆上挂著一張巨幅的羅漢畫，畫上的羅漢呲牙咧嘴地對我們發笑，兩隻手擎在胸前，作出歡迎我們的

样子。东一間作主席的寢室，一看就知道關桂兰是花費了一番苦心的，他把鋪搭得高高的，不知墊了多少稻草，床上松軟松軟的，一点不比沙发床差；西一間就是主席的辦公室，辦公桌是用兩張單桌對起來的，上面擺着主席的辦公用具和一部電話機。“嘿！好漂亮！”我和小曾高興得老是在屋內兜圈子。不用說在長征途中，就是在老蘇區，主席也沒住過這麼好的房子！我們這些人一看到主席能有個好地方舒舒服服地休息休息，比什麼都高興。特別又趕上了年節，這就更有意義了。可是，還象少點什麼，猛然間想起來：“凳子，我們快去找凳子！”我把小曾拉住就跑出去了。我們倆一口氣搬了二、三十個方木凳子圍着辦公桌，象是要舉行盛大的酒會。小曾問我擺這麼多干什么，我說：“過年嘛！晚上主席回來了，少不得中央委員和總部各位首長都要來和主席一道慶賀新年，沒有凳子他們坐什麼呢？”

小曾聽了我的話不斷地點頭。

布置完了，吃晚飯的時候，心里老是熱呼呼地吃不下。心想等主席回來看見我們這布置，一定會很高興的。中央首長們來玩，也許要夸奖我們一頓哪！

吃過飯，我就和小曾商量給主席準備吃的東西。小曾說：“過年啦，一定給主席準備點他最愛吃的東西。”

于是我們就把主席平素喜歡吃的東西念叨了一遍：牛肉、辣椒、炸豆腐……。

“還有‘撈糟’呢！”小曾象發現新大陸似地大喊了一

声。

“捞糟”就是南方常见的“酒酿”，又名“甜酒”，那时我们叫它“捞糟”，主席很喜欢吃。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天已经黑了，我就和小曾提上小、马灯接主席去。

到了会场，会议还在进行。闕桂兰一见我们就象煞有介事地问：“满意吧，我的同志！”我这才明白，原来他那股神秘劲儿，就是存心让我大吃一惊的。我伸了伸大拇指头，他满足地笑了。

“不错是不错，”小曾忽然在一旁说：“就是忘了给主席准备吃的。”

“什么吃的？”闕桂兰着急地问。

“‘捞糟’！”

“对了，‘捞糟，捞糟’，我马上去搞。”闕桂兰说着就往外跑。

我连忙喊住他说：“小曾和你穷闹，‘捞糟’我们准备好了。你赶快回去，别叫炉子灭了。”

闕桂兰狠狠地瞪了小曾一眼，又对我们说：“你们注意点，外边下着大雪，路不好走。把灯弄亮点。”

我点了点头。

会开到十点多钟才结束。我看见主席在披大衣，就提着灯迎了上去。路上，主席问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儿远吗？”

我说：“不算远，大约有二、三里地。”

这时，天空正落着雪，風很尖利，主席穿得很单薄，我在后面提着灯，心里一阵发酸：想起离开苏区两个多月，主席忙得很少好好休息，行軍时，还常把馬让給体质弱的同志騎，他自己步行；宿营以后，人家休息，他却开会、看电报、拟文件……怎么能支持得了呢！要是能在这个好地方多住几天，痛痛快快地过个年，让主席好好休息一下該多么好啊！

想到这里，我禁不住說：“主席，过年了，咱們該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呢！我們都准备了！”

主席停了脚步，面对着我，順手給我正了正帽子，非常温和地說：“怎么，过年的事都准备好啦？”

“是呀！准备得可好啦！”小曾說。

主席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曾，沒有回答，他陷在沉思中。

“怎么回事？”我心想：“主席也許沒听进我們的話，还在考虑会議上的問題呢。”

等了好大一会，主席說：“我們不能在这里休息，还有比过年更紧要的事情呵！”

“什么事？”我惶惑地問了一句。

“我們要爭取時間突破天險，打过烏江去！”主席說到这里，拍着我和小曾的肩膀說：“我們是紅軍。什么事情对紅軍來說最要紧？現在就是打仗、消灭敌人。突破烏江很重要，这是一件大事。你們觉得这猴場就是个大地方了，不，大地方咱們中国多得很。遵义就比这里大，还

有比遵义更大的。等我們突破烏江，打开遵义；在那里过年才有味道哪！”

接着主席簡明地給我們讲了一下当时的形势：蒋介石派了薛岳、周渾元等几个纵队，紧紧地跟在我們后边，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搶渡烏江，把敌人远远地甩开。

听过主席的話，心里說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但“打过烏江去！”这一紧急的任务，又給了我新的力量和喜悅。

到了住地，屋中央燃起的大吊灯照得滿屋通亮，主席看着我們的布置笑着說：“可真有个过年的样子。”說罢，又打开了文件，准备开始夜間的工作，一面告訴我們他已在总部用过飯，不必再为他准备了。

“可是我們为你准备了好东西呢！”小曾搶着說。

“什么好东西？”主席抬起头問。

“‘捞糟’，你最喜欢吃的。”

主席看了看我們，站了起来，指着那一圈凳子讓我們坐下来，然后對我們說：“咱們就在这儿一同过年吧！”

吃过东西，主席讓我們去休息，自己坐下来又开始了工作。

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就傳来了好消息：先头部队已到达烏江。我們也立即出发向烏江奔去。

六 金沙江畔

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一個夜晚，由九軍團、一軍團、五軍團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和中央機關到达了金沙江邊，這是我們突破烏江后遇上的第一條大江。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龍般地翻騰着。我們船隻很少，大家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軍團的負責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天快拂曉，主席帶我登上船渡過了金沙江。一下船，他又和當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研究隊伍渡江后如何前進的問題去了。我去給他找房子，安排住處。

江岸邊是光禿禿的石山，沒有什麼房屋，只有四、五個不像樣的洞子，洞子里濕得很，沒有木板，就連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在潮濕的地下鋪上一塊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給主席搭好了鋪。心想：等他回來休息一下。別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他這幾天太累了。

搭好了鋪，他的文件、地圖等辦公用具都還沒有打開。過去一到宿營地，這些東西都是我和秘書黃有鳳同志一塊拿出來，擺在臨時搭起的辦公桌上的，可今天，一來沒有辦公桌，二來黃有鳳同志還沒有過江，怎么辦公呢？我拿出地圖往牆上挂去，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

上。沒有桌子，辦公用具也擺不開。這時，過江已有吃兩頓飯的工夫，主席也許快從劉總參謀長那里回來了，我連水還沒有燒好呢！他累了一夜，回來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沒管辦公用具擺沒擺開，去找地方燒水去了。

天亮了，主席回來了，找人去叫我。我一進洞口，看見他站在洞子中間沉思。我說：“您回來了。”他答應了一聲，接着就問：“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鋪說：“好了！這地方連木板也沒有，鋪只好搭在這地下了。請您先休息一會，水馬上就開。”說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繼續燒水。還沒有走出洞口，他就把我叫住了：“辦公的地方呢？”我隨口答道：“黃秘書還沒來到，這裡連張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點水吧！”他像是沒有聽見我的話，向前邁了一步，用他那嚴肅的但又是溫和的語調說：“現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飯喝水都是小事。江那邊有我們兩三萬同志在等着哪！這是幾萬同志的性命呀！”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他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主席又向前走了幾步，說：“先去找塊木板架起來也行！”我這才恍然大悟，飛也似地跑出洞口，好容易找到了一塊堵洞口的小木板，忙搬進了主席辦公的洞子。主席親自動手和我把它架了起來，擺上了辦公用具，這時，我突然想到燒的水一定開了，便想出去取來。我剛想迈步，就聽見主席叫道：“陳昌奉！”我說：“有！”“你過來。”我走過去，站在剛架起來的“桌子”對面。主席說：“我今天要處分你呢！”雖然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温和，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呆呆地望着主席。他接着说：“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好吧！”就在他对面坐下来。这时，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电报，电话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他忙得一点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竟想流出泪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得这样。

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好坐在一旁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但今天一看主席在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角我，并微微发笑，我更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凉了一杯，才又坐下来。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主席又说：“快睡去吧！”我原来存在眼内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作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好了，下次不可，去玩去吧！”一样，心里翻腾的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

过。

金沙江对岸的几万部队，一直过了三天三夜，主席也三天三夜没有离开那张办公“桌”。

七 彝族人民欢迎毛主席

渡过金沙江以后，我們到了西康东南的冕宁。

刚到冕宁就接到准备过彝族区、渡大渡河的命令。要求每个人带十四天的粮食、一根竹竿和一条两丈多长的绳子。冕宁的街面上运粮的、扛大竹竿的、用各式各样的东西编搓绳子的到处可以见到。

我們警卫班的同志，虽然经过胡长保班长几次督促，准备得还是不太好。特别是我和小曾两个人。当时我們有一种錯誤思想，觉得每一次出发，上级总是让多带这，多带那，可哪一次也用不完。記得有一次，从貴州的土城到云南的榨西，我們背了很多粮食，到了榨西不但粮食不缺，就連肉也能买到。說到竹竿，当时我們都有这么个想法：不管大渡河多么厉害，反正擋不住我們主席。主席过去了，我們也就沒有問題了。至于彝族区，我們覺得有过苗族区的經驗，又是跟着主席，能有什么問題呢？但也有人說彝族区不同于苗族区，那里的老百姓都挺厉害。

一天，趁主席休息的空里，我和小曾去找我們的房东老大爷，想問个清楚。我們这位房东老大爷有个特点，很喜欢說話，一說起来就住不了嘴；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他

也能說得天花亂墜、有聲有色。我們和他說起彝族區的情況，老大爺忽然精神抖擻起來了，放大了嗓門：“你們說的是保保嗎？唉呀呀！那可厲害啦！”

“怎么个厉害法呢？”我們問他。

老大爺津津有味地講了下去：

“他們都是野性子人，喜歡打仗；特別恨咱們漢人，一見了漢人哪，他們的眼珠子就紅了，只要教他捉住，就別想活命。……”

“他們既然这样厉害，就躲着他嘛！”小曾說。

“怎么躲呀？除非你別踏着他們的地界；踏上了就等于落进了‘迷魂陣’；滿山都是他們的人，大喊大叫，又打冷槍——听說槍法還百發百中呢！”

“他們为什么对漢人那么仇恨呢？”我們又問。

老大爺眯巴眯巴眼，搖搖頭，說：“這我可說不上。”

听过房東对彝族人这一番描述之后，虽然不全相信，可思想上增加了負擔，別的倒不怕，就是打冷槍这一手很使人担心。怎么搞的？过去上政治課的時候，每每談到少数民族，总說他們受白軍的压迫比漢人还重；說他們都是我們的好弟兄，为什么沒有談到彝族杀害漢人这一点呢？

臨离开冕寧頭几天的一个晚上，我給主席送飯的時候，主席叫住我問道：

“陳昌奉，你們准备得怎么样了？”

当时滿腦子都在想彝族區的事，主席的話也沒听明

白，我随口答道：“我不知道他們准备的情况。”

“你哪？”主席問。

“还是那两个米袋子。”我說的那两个米袋子，是从江西帶來的，一袋子頂多能装三斤。

“那够十四天吃的嗎？”主席又問。

我見主席沒有生气的样子，便說：“再也沒有地方装了。”

主席說：“要想办法，人家部队怎么能装下呢？”主席停了停又說：“我們是中央队，要做出个榜样来。今天开会，我看見总司令都扛上竹竿了。”

“主席，”我把压在心底的話終于說了出來：“听說彝族人好厉害，是嗎？”

“你听哪个讲的？”主席問。

我就把房东老大爷的話統統告訴了主席，并且問：“这都是真的嗎？”

主席笑了笑，反問我：“你說哪？”

我笑着搖搖頭。

主席說：“四川的彝族人和广西的苗族人都是一样，他們就是受白軍迫害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們也最痛恨白軍。可是他們對我們就不同了，我們尊重他們，把他們看成是我們的弟兄，要和他們團結起来，共同反抗白軍的压迫。”又說：“我們朱总司令和刘參謀长(即刘伯承)都是四川人，他們最了解彝族人。彝族人听說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你們怕什么呢？”

“可房东老大爷为什么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儿？”

“那是白军有意造的谣言，好挑起汉人和彝族人之间的仇恨；老大爷也没有亲眼看见，自然很容易受骗。”

听了主席讲过之后，我们警卫班的同志都放心了。立即行动起来准备粮食、竹竿等必需品。

两天以后，我们从冕宁出发（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已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弟兄了），走到中午时分便进入彝族区。那时正是五月的季节，在我们的江西，田野早就被金黄色的稻田打扮起来，可这彝族区却是一片荒凉。看不到稻田，也看不到居住的房屋；只见路两旁、高山之间的树木丛中星星点点的一些低矮的草棚子。

走进山区没多久，忽然在我们对面冲过来一群服装稀奇古怪的男男女女，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这一来把我和小曾吓了一跳。直到他们靠近跟前，才看出不像是打仗的样子，倒像是欢迎我们。只是从拥来的人群中间，走出四、五个个头高大的妇女，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一只火红的大公鸡向主席跑来，把主席团团围住，热情地在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话。主席一边走一边向他们点头，并且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双手放在胸前表示谢意。我和小曾等同志，也学着主席的样子，把手举到胸前。

主席向前走，那四、五个抱着公鸡的妇人一步不离地跟在他两边。这个时候，山顶上、山腰里、山脚下，到处都是彝族人民；他们有的高高地举起两手，有的跪了下来；还有的大声唱了起来！那种热烈的场面呵，把我们都感

动得流下眼泪来了！

“你们看，”主席转过脸来对我们说，“他们不但不打我们，还出来欢迎我们！你们想想看，这是为什么？”主席说罢又向前走了，我们几个人可就噤哩哇啦地讨论起来了。

过了一会，小曾跑到主席跟前说：“主席，他们虽然也是咱们的好弟兄，可他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也不懂，就和到了外国差不多。”

主席说：“我们中国大着哪！你江西人都听不懂我这湖南人的话，还能听懂彝族人的话吗？”

这话说得大伙都哄笑起来。彝族群众看我们大笑，也跟着狂笑起来了；他们笑得那么单纯，那么天真！谁能说这样的人的心肠是“残酷凶狠”的呢。

我们就是在这样充满了亲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中，渡过了“神秘”的彝族区。

八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通过彝族山区，经过一、二百里地的行军，我们随主席到达了大渡河边的安顺场，然后从这里沿大渡河上行，听说要经过一个名叫磨西面的集镇，再去泸定桥，渡大渡河。

这一带尽是层层的山巒，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乱草和干硬的小树，行走起来十分困难。主席虽然有一匹馬，但在这种地方根本不能騎，只好和我们同行（其实在好道上，他的馬也大都让給伤员和体弱的同志騎）。蜿蜒曲折的小路，由于山势和岩石的阻碍，时上，时下，总是在山上行进。山陡得很，越往上走越难，杂草乱树也更多、更稠。有时不得不停下来，让工兵砍一阵再走。不管道路怎么样，主席总走得那么带劲，在他的脸上，找不到因长期行军作战和紧张工作而留下的疲劳的痕迹。他经常回过头来对我们说话，有时还讲一些小故事。我们见主席这样，满身的疲劳早就飞到九霄云雾以外去了。往上爬，往上爬，在山中间往四周看，什么也看不到，一爬到山顶，大渡河水便像一条突降的凶龙，对我们大声呼叫起来。

天近黄昏，我们爬上一个山头，安顺场被我们抛在后

边了。和我們一起行进的部队开始休息了。我和小曾他們商量了一下，便走到主席跟前說：

“主席，咱們也休息一会吧？”

主席停下来，望着我說：“累了嗎？”

“不累！”我接上說：“您看人家部队都开飯了！”

“好！”主席笑着對我說：“告訴大家，咱們也休息，开飯。”

見主席停下来，我們警卫員、担夫、飼养員都圍了上來，在一條小溪旁坐了下来，拿出干粮，主席便和我們一起吃起來。飯不怎么好，又加上一天的行軍，嗓子眼里干得很，但大家都拚命地往下咽，我們知道，不吃下这点东西，走下一段路將更加艰难。

“啊呀！咱們光吃干的，沒有点水喝怎么好！”林育才嚷了起來。

經他这一提，我們也覺得嗓子眼里像冒火一样，干得难受。

主席望着我們笑着說：“你們看，”他指指我們身旁潺潺而流的小溪，“这不是水嗎！”說着他自己用双手捧起一捧水喝了一大口：“这水很好，很清涼。”

見主席喝得那样香甜，我們也都伏下身去喝了起來。忽然傳來了陣陣鼾睡声，不用看就知道，又是黃应和。

看黃应和睡得这么快，我們都覺得好笑。吳洁清早就沉不住气了，他用小缸子舀了半缸子水就要往黃应和臉上倒……

“吳浩清，”随着声音我們都轉过臉去望着主席，“黃应和很累了，让他休息一会吧。”說罢，主席站起来走到黃应和身旁，把他那枕着乱草的头輕輕地抬起来，垫上了主席自己的衣服。黃应和的身子微微一动，臉上露出一絲稚气的笑容，隨即又睡去了。

我們几个人站在一旁，看着主席的动作出神了。主席回过头来笑着對我們說：“你們也休息休息吧，明天还要前进哪！”

我們一声不响地在原地蹲下来。我靠在一块不大的石头上躺了下来。

初夏的黄昏很凉爽。我虽然很累，但怎么也睡不着。看看黃应和枕着主席的衣服睡得那么香甜；再看看主席正慢步在山頂，像在考虑什么问题。远处大渡河水嘩嘩地响着，夕阳的余輝把滿天燒得赤紅，主席那身灰色的軍装似乎变成橙黄色的了。

这一夜，主席和我們就宿在这座山上。

第二天一早从这里出发，快要到达磨西面的时候，遇上了一条河。河水很寬，很深，不能涉渡，只有一座不到两公尺寬的小桥，我們到时，部队正在过桥。人多桥窄，显得十分拥挤，大家見主席来到，馬上让开一条路，让主席先过。主席还未及說話，飼养員老余牵着馬就上了桥。馬一踏上小桥，受惊似地跳起来大声嘶叫，頓時桥上更乱了。主席赶到桥头，对老余說：“不要过啦，先让同志們过！”

“衣服和行李都在上面哪！”飼養員大聲地喊。

我們幾個警衛員也知道馬上是行李、衣服，如果馬過不來，晚上主席就沒有鋪蓋了。所以我們也在一邊加油：

“主席，慢慢地它就會過來了。”

“不過來怎麼行！”

.....

“哎！”主席那慈祥的雙目掃了我們一圈對我說：“陳昌奉，趕快幫老余把馬牽回去，讓部隊通過！”

雖然部隊的同志都幫助老余拉馬過橋，我還是跑到橋心，幫老余把馬拉了回來。

我們把馬拉回來，主席催着部隊趕快過橋。一直等部隊過完，我們才隨主席走過去。

晚上到了磨西面，主席對我們大家說：

“要記住，無論什麼時候，我們要想到部隊，想到大家！你們想，為了咱們一匹馬，誤了那麼多同志行軍，該多不好呀！”

離開磨西面，我們隨主席到达了泸定。這裡河面較安順場雖窄，但水勢却更急，且兩岸全是矗立的絕壁。泸定橋是用十三條像飯碗那麼粗的鐵索構成的。橋頭的地下有很多鐵樁，鐵索就系在鐵樁上。橋兩旁的扶手也是鐵鏈的。我們隨主席一到泸定坡就碰上了林彪、劉亞樓等首長，他們帶着主席在一座大教堂面前停下來，環視了一下。隨後主席便帶我們過泸定橋。

橋上原來鋪着的木板，都被敵人的炮火打着了。我

走到桥边，看到那碗口粗的铁索大桥和被烧焦了的木板，还有那奔腾的河水，心里有些紧张。主席看透了我的心思，指着我的头问：

“陈昌奉，害怕吗？”

“不怕，咱们走吧！”我虽然这样说，但心里跳得很厉害。我看看吴洁清他们几个也很紧张。是呀！像这样大而急的河流和奇怪的桥梁，我们还是头一次见哪！

主席用双臂把我们几个小鬼挡在面前说：“这座桥很有名，和我们走过的桥都不一样，你们年轻轻的能过这么大的桥，很简单！到了桥上不要心慌，不要往下看，掉不下去。”主席停了停笑着问道：“你们害怕不？”

“不怕！”我们几个同声回答。

“好，咱们走！”

主席在前面，我们紧跟着。踏上铁桥，我的心像突然被什么吊了起来，跳得厉害。我默默地念叨着主席的话，叫自己别发慌，别害怕，别往下看。我双目望着主席，他走得是那样轻松、自然，昂首望着两岸直入云霄的绝壁。巨大的咆哮声似乎也不能打断他的思虑。走到桥中间，由于人多，铁桥开始左右摇摆起来。我一把抓住身旁的铁链停了下来。主席回过头来和我说话，但因河水响声太大，我根本听不清，看样子是问我怎么样。我摇摇头表示没有关系。主席停下来拉着我的手，一起往前走。也不知是大半天没出事，还是因为我的手被主席拉住了，我的胆子顿时大了起来。原来轰轰响的耳朵，也忽然能分辨

出各种声音来了。我低头望桥下看去，只见混浊的河面上腾起的巨浪，像无数把锐利的长剑，直插大桥，使人看了真有点头昏眼花的感觉。抬头看我们桥上的同志，有的站着一步步地挪动；有的全身伏在铁索上匍匐前进；有的几个人拉成一行，连说带笑地前进……主席一面拉着我的手，一面不停地回头看着大家，有时也停下来，向大家摆手、说话……

桥终于落在了我们的身后。”

“主席，”到达岸上，我走到主席身边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不用想过来。可敌人……”

主席笑着对我们说：“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不能相比的，你们说对吗？”

“对！”我们齐声回答。

九 向水子地前进的路上

渡过大渡河，在花岭坪住了几天。这天，我们又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据说要走一天才能到。

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机关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机关一块前进了。这次跟着主席的有我，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

我们一行到了一个上下十多里的山间，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我们只好拉开距离前进。胡长保同志走在主席前面，我走在主席后面。主席仍埋头走路，象在思考问题，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敌机，我们几个人的心里却非常紧张。

敌机转到我们后面去了。我的心情刚略微轻松一点，忽然听到从背后的上空，传来两声刺耳的呼啸声。我立刻意识到是炸弹落下来了，猛喊了一声：“主席！”便向主席急奔过去。可是刚跑出几步，几颗炸弹便在我的身边和前面爆炸了，我被爆炸的气浪推倒了，主席也被烟雾罩住了。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眼便看到主席正蹲在一个负伤的同志身边。一见主席没有负伤，心就象从半空中放下了一样，不自主地伸手擦了一下前额上的汗水和灰尘。

我跑到主席身边，見主席正在撫摸着胡长保同志的头。胡长保同志躺在地上双手紧捂着肚子，头上冒着密密麻麻的汗珠，一声不响。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鍾福昌同志赶来了。主席急促地对他说：“快，給他上点药。”

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說：“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你們繼續前进吧！”几句话的工夫，他原来那张紅潤的臉，竟变得象一張黃紙一样。

“没关系，你会好的！”主席安慰着胡长保，又急忙帮助鍾福昌給他包扎好了伤口。然后，主席坐在地上，象托着自己快入睡的孩子一样，把胡长保同志的头放在自己的臂弯里，輕声地說：“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們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长保在主席怀里，两只有些失神的眼睛，留恋地紧盯着主席。当他听說要抬他走的时候，着急地，但却非常吃力地望着主席說：“主席，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我没有什么牵挂，最可惜的是我不能跟您到陝北，看一看我們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两颗亮晶晶的泪珠，滚出了眼角。他喘息了一会，喉嚨里象有什么东西堵塞着一样，繼續說：“我牺牲之后，如果可能，請您轉告我的父母，他們住在江西吉安。”

主席大概已經看出了胡长保伤势的严重，他沒有讲什么，只是更紧地抱着他。

“班长，你会好的，你会和我們一起到陝北的。”我和鍾福昌同志一齐安慰着他。

胡长保摇了摇头，一字一字地對我說：“陈昌奉同志，我不能繼續保护主席了，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啊！”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听不清楚了。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又一次目不轉睛地望着主席和我們，嘴唇微微顫动着，一字一字地說：“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

“班长，班长！”我和鍾福昌同志一齐急促地喊着，可是他已經再不能答应了，止不住的眼泪，流到我的臉頰上。

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来，把他輕輕放在地上，然后慢慢站起来，低声對我說：“夹被！”我順手把挂在身上的夹被递过去。主席慢慢地将夹被打开，小心翼翼地盖在胡长保同志的身上。

天，一絲風也沒有，山上的青草和树木一动也不动，它們也象在向烈士致哀。

我們擦干了眼泪，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跟着主席又繼續前进了。

一〇 雪山草地間

夹金山上的風暴

渡过大渡河之后，我們差不多一直行进在群山之中。六月間，来到最罕見的犬雪山——夹金山下。太阳还没有落，可是它的热力在这座白茫茫的冰山面前，已經失去了作用——我們都被冻得发抖。

我們在山下住了一天，主席吩咐我們准备一些生姜、辣椒之类刺激生暖的东西，为的是上山好和严寒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开始爬山了。

夹金山，像一把銳利的长剑，直插万里高空，在阳光的照耀下，全身就像披飾着明亮的鏡子，光芒四射，使人头晕眼花；山頂上不断揚起层层大雪，像挂起了巨大的帳幕，使人觉得面临着仙境。

刚开始，雪沒有多深，还算好走。过去二十几分钟就不行了，雪越来越深，一步不小心就掉在深窝里，半天爬不出来。要是找雪淺的地方走，脚下又发滑，走两步就要退三步。主席走在我們前面，吃力地向前弯曲着他那高大的身軀，有时連退好几步，我們赶忙跑上去搀扶，可我

們脚下往往滑得站不住，倒是主席用他的一双大手把我們拉住。主席沒有穿棉衣，走了一会之后，他那單薄的灰色夾褲，早已被深雪濕透了，那双薄薄的黑色布鞋也已濕透并凍得發亮。他實在太累了。

“主席！”我走上前去，好容易站下來說：“這山太難上了，您讓我們攙扶着您走吧？”

“不！”主席沒有停下來，只是往前走着，說：“你們和我一樣地累嘛！”

走到山半腰，忽然卷來了暴風，烏黑的濃雲貼着山頭越來越大，暴風揚起了紛紛大雪，沒頭沒腦地朝我們撲來。

“主席，要下雪了吧？”我趕了几步走到主席跟前，拉着他的衣角問。

“是啊！”主席迎着暴風抬頭望去，“馬上就要來了，讓大家都準備一下。”主席的話剛說完，一陣雞蛋大小的冰雹呼嘯着打了過來，立刻我們像置身在驚濤駭浪的大海裡，撐着的雨傘和披着的油布都失去了抵抗的力量。大家立刻把油布撐了起來，讓主席在中間，其餘的人圍在四周。只有馬夫老余最艱苦，雹子一下，馬嚇得滿山亂蹿，一點也不聽話了。這時，只听人喊馬叫，震耳的雷聲，簡直和天塌下來一般。山頂上傳下了有力的呼喊：“同志們！堅持住！堅持住就是勝利！”抬頭望去，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展，暴風雪都向它那鮮紅的色彩低頭了。

我問主席：“主席，那是誰在喊呀？”

“是宣傳隊的同志們！”主席說：“我們要很好地向他們學習這種頑強的精神。”

過了一會，暴風雪驟然停止了，火紅的太陽又露面了。主席離開了油布，站在雪山中間了。揚起的雪花朝他打去，他却一動不動地立在那里。

“這一場戰鬥怎麼樣？”主席說：“有負傷的嗎？”

大伙都說沒有。只有老余牽着馬跑到主席面前訴苦似地說：“雹子把我的手打腫了。”

主席立刻叫鍾福昌給老余上點藥，老余卻笑着說不要，趕緊拉着馬走了。

我挽到小曾身旁逗引他說：“哎，伙計！怎麼樣？”

“怎麼樣！”他用手指指主席：“主席都能行，咱們還能落后嗎！”他看了看自己深埋在雪里的雙腳說：“不過，這玩意算是‘交公’了！”我明白他是說腳凍麻木不聽使喚了。

越往上走越困難。記得在山下時，老百姓對我們說：“到了山頂，不能說話，也不能發笑，要不，山神就會把你掐死。”我們當然不迷信，但想想老百姓說的話是有道理，這當兒，我只覺得胸口像壓了兩盤石磨，透不過氣來，心怦怦跳得很快，不用說笑，就是連張嘴也很困難。仿佛一張嘴，心就會從里边跳出來一樣。再看主席，他仍舊健步地迎着風雪往前走去。

山頂上的宣傳員們又喊話了：

“同志們，加油啊！”

“往前看，不停留！”

我們終于到达了山頂。這時只見潔白的雪地上，三人一堆、五人一簇地坐在那里；有的索性躺了下來。有些同志一見主席上來了，即刻跑了過來招呼主席：“請主席休息休息吧！”

主席一見這種情況，立刻走到他們中間，溫和地說：“同志們，我們不能在這裡休息呀！這裡空氣稀薄，有危險。再加一把勁兒，下山去我們就和四方面軍會師啦！”主席這麼一鼓動，大家的情緒像開了鍋的水，馬上沸騰起來，哄地一聲齊向山下滑去。我這時不知是因為勝利的喜悅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頭腦地一聲發昏了，只覺得腳下的高山搖動了，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搖擺起來了。我一步扑到主席面前說：“主席，我……”話沒說完就昏了過去。這時，我心里還是明白，知道主席正用兩只胳膊扶着我，不停地呼喊我的名字。不過我像是登入了仙界似的，覺得一身飄飄然，呼吸困難得說不出話來。不一會，一陣大風卷着雪花扑在我臉上，我的頭腦開始清醒了，我睜開了眼睛。小曾等同志都圍着我問怎麼回事，主席也問我：“怎麼樣，好了吧？”

我立刻掙扎着站了起來。看看主席，他雙腳深深地埋在雪窩里，同時不住地回頭望着那些沒有上來的同志們——他們走得很慢，像一條長蛇彎曲而上——主席不斷地向他們招手。

風越來越大，簇簇烏雲又蓋頂而來，我不知哪里來的一股勁兒，一下子跑到主席跟前大聲地叫道：“主席，你不

能在这儿，快走吧！”

下山好像比上山容易些，但山背面没有太阳，更加寒冷，我们都穿着单衣，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把一条夹被圈在腰间，像穿了裙子似地连跑带滑地往下滚。又走了没多远，就碰上了带着“扩大川西北根据地”标语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见到他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力量也足，劲头也大了，很快地就和主席下了山。回头仰望，白茫茫的山上，红旗仍然在飘动，宣传队员们不疲倦的鼓动声，还隐隐地响在耳边。

在卓克基

翻过夹金山，在懋功休息了几天，接着又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来到了川西北的卓克基。在这里，我们又紧张地进行着过草地的准备工作。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听说卓克基是个丰衣足食的地方，那里有很大的喇嘛庙和大土司。我们听了很高兴。心想：这一回可能给主席找点吃的东西了！——主席自从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会议开得更多了。有时整天开会，不用说睡觉，就连吃饭的空儿也很少，晚上总是很晚回住地，而一回来，照例地又坐下来，开始了夜間的工作。自从过了大渡河以后，主席和我们很少吃到菜类和有油性的东西，甚至连盐也好久没有吃到了。在这样长途行军和繁忙的工作劳累中，没有吃的那怎么行呢？于是我和小曾一到卓克基，就先忙着给主席搞吃的东西。可是结

果大失所望，那里的群众不分僧俗，都受了国民党的欺騙宣傳，跑得連个影子也沒有，不用說好吃的东西，就連一根棍子也不易找到。

来到这里，还有一項緊急任务，是打草鞋，准备过草地。我們几个警卫員和挑担的鍾永和同志，每天出去搜集草繩和破布之类的东西。

一天，我們在大土司宮里的一个很小的暗室中，发现了一大筐猪皮，皮面都很大，差不多都是完整的一張，上面还带着猪毛。这一发现，可把我們乐坏了，用它做鞋底，再也沒有比它更好的了！于是我們乐呵呵地把它抬了回去，每人拿了几張，用小刀割着，忙着做鞋底。

当时虽然几个月沒有吃上一点肉，可誰也沒有想到这东西可以吃。

故事发生在鍾永和的身上。他有一个很小的鉄桶子，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它燒水喝，比我們临时向老乡借的鉄鍋快得多。主席为这件事还表揚过他，說他行軍准备工作作得好，讓我們向他学习。从这以后这个小鉄桶和鍾永和更是形影不离，万一遇上什么事我們和他頂嘴，他就搬出了他的小鉄桶調皮地說：“主席都让你们們向我学习，你們还和我吵！”实在說，鍾永和是我們警卫員中我很喜欢的一个，他为人忠厚老实，不知道別的，就知道工作，又很听上級的話。有一天，我、小曾和吳清清从外面回来，一进院子，一股很濃的香味，钻进我們的鼻子里。再看鍾永和，他正爬在地下聚精会神地吹火，他那小鉄桶吊

在火上来回搖擺着。我朝小曾和吳洁清作了个眼色，輕輕地走到他的身旁，我猛地喊了一声：“啊！你在搞什么鬼名堂？”本想吓他一跳，沒想他倒像什么也沒听到似的，連头也沒抬，說：“調皮鬼，你別管！”

“別管！”我朝小曾又作了个眼色，我一下子把鍾永和抱住，吳洁清和小曾就走到小鉄桶跟前一看，原来煮了滿滿一桶子猪皮。香味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你煮这玩意儿干什么？”我們問他。

他仍然头也不抬，沒好气地說了一个字：“吃！”

“哈！还能吃呢！”一开始，我們都不信，又一想，可能好吃，就凭这一股香味吧，也就够美了！于是我連忙把他放开，要求他對我們介紹一下他这个偉大的发现。

他說，那天他拿到猪皮以后，立刻就割了一块准备做鞋底，可是毛太多，刺脚，不好走。他就想，用个什么法子把这些毛弄掉呢？想来想去也沒想出个主意，于是他就去找老余……

鍾永和就是这么个脾气，不管說什么总是有头有尾，慢騰騰地一点也不着急。我們就催促他：“哎，简单点行嗎？”

他还是按着他自己的节奏繼續說：

“我就去找老余，老余說：‘你那小鉄桶呢？煮呀！煮一煮就会掉的。’这样，我就煮起来。哈！猪皮下水沒有二十分钟，一股子香味就往肚子里钻，这一下子使我产生了吃的念头，又煮了一个时候，我弄出一块来一看，猪毛

全沒有了不說，那豬皮大大地脹了起來，又肥又嫩又香！我上去就是一口，啊呀！那個好吃可就不用提啦！”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們幾個人听得都出神了，小曾趕忙站起來往小桶邊走去，口里念叨着：“這是真的嗎？”

他把一隻手伸向小鐵桶，一面回頭望着鍾永和：“老兄，我，來一塊怎麼樣？”

“不行！”鍾永和一把拉住小曾的手，然後對我們解釋說：“我這是……這是給主席煮的。他有好幾個月沒有吃到一點兒菜了。”

听說是給主席煮的，小曾立刻把手縮了回來。我心裡倒是想：主席一向不喜歡吃肥肉，這豬皮恐怕更不吃了吧。

太陽剛剛偏西，主席回來了。主席一進門見我們幾個人正圍在一起搞豬皮，就問：

“你們在搞些什麼？”

我們都站起來。鍾永和慢騰騰地說：“主席，我們給您弄了點菜。”

“什麼菜呀？”主席一邊說一邊往屋裡走去。我跟上前去把帽子接了過來說：

“是豬肉！”

主席听說豬肉，便停下來望着大家說：“哪里來的？群眾不在家，你們又犯紀律了吧？”

“不是的！”鍾永和走上前把這事從頭至尾又說了一遍。然後怯生生地問：“主席，您吃不吃？”

主席看了看大伙儿，和善地笑着说：“你们能吃，我就能吃！”

听主席这么一说，我们心里畅快极了。立刻把准备好的搬了来，我们围着主席，一同吃起来。主席一边吃，一边又开起玩笑：“咱们这算是一次很成功的会餐！”说得大家都大笑了，连最不爱笑的鍾永和也张开了嘴巴，大声地哈哈笑了起来。

雨夜露营

早上从卓克基出发还是晴空万里，走了没有二十里地，天气就变了。乌黑的浓云布满天空，牛毛细雨纷纷地撒下来了。

这一带全是山区，连一条蚯蚓小道都不容易找到。我们只好在崎岖不平的山间行进——忽儿是岩石如刀的夹壁，使人看到不敢下脚；忽儿又是枯枝落叶地区，有的地方树叶竟有二、三尺厚，踏上去就和棉花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不大一会工夫，雷雨紧跟着闪电“轰隆”“轰隆”地响开了，毛毛雨顿时一变如注，夹着枯烂的树枝象雪山上的冰雹一样，向我们袭击过来。顷刻间，主席和我们的衣服都湿了。

天不过四点多钟就黑了下來，雨越下越勇，我们处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荒山野林中。天黑得奇怪，象是有人用厚厚的黑布在我们头上一层层地盖着。多么需要亮

光呀！但是沒有。主席的小馬燈早就沒有煤油了，雖然一彎腰就可以拾起木柴，但這些被雨水浸透了的东西，對我們又有什么用處呢？我們憑着手中的木棍，摸索着前進。棍子告訴我們前面是一塊石頭，但落下的腳却深深地浸在水坑里。實在是寸步難行，束手無策。看着主席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雨夜里，步履那麼艱難勞累，心里象着了火似地焦急和不安——他，每到一宿營地，當別人伸開四肢尽情地休息的時候，便忙於一系列的會議、電報、擬稿……他是多么辛苦呵！

“主席，我們停下來吧？”我向主席提出了要求。

主席停下來，沉思了一會兒，說：

“好。那麼告訴大家知道。”

主席一句話剛說完，一道閃電打來，轰轰的雷聲送來了蓋頭的大雨。我趕緊將手里的破傘往主席頭上罩去，但已經晚了。主席一把把我拉到他怀里，關切地問：

“怎麼樣？”

我用手摸了摸臉，笑着說：“洗了個臉，您……”我用手一摸，主席的衣服已經全濕透了。

我們趕緊找地方休息，可是問題來了，跟前到處是水洼、石頭，天又這麼黑，在哪兒落腳呢？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憑着手腳的靈敏，才給主席弄了個鋪，兩頭吊在兩棵小樹上。

主席用手摸着那濕漉漉的“吊鋪”，开玩笑地說：“睡上江西的涼床了。”

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可乐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往往主席的一句笑话，就使得同志们忘记了疲劳，增加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等主席躺下，我就开始为自己找地方。雨还在下着，我各处摸索着，忽然触到一个崖壁，再往下一摸，底下有个洞洞，高兴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头就往里钻；天哪！只听得“咚”一声，头被狠狠地碰了回来！——真倒霉！原来不是我所想象中的石洞洞，而是一个小小的山口子！可这也很难得，我忍住痛，把头又靠在口旁，身子一歪就躺了下来。不好！底下怎么那么多水呀？用手一摸，是个不大不小的水坑呢！唉！没有关系，伸手把身上的小包包解下来垫了进去，又把主席的破伞撑起来放在肚子上，尽管雨点不停地打在脸上，但我的头一靠上石块，很快就睡了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耀眼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木射进来，团团的雾气象轻盈的棉絮，缭绕在山间。雨已经停了，可树叶上的积水仍然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巴答”“巴答”地向下滚来。

我一睁开眼，觉得头痛得很，而且痛法特别怪，只准仰头望天，不准低头看地。就是有水点落下来，也得死停着让它掉进鼻孔里，要不然，一低头和一转脖子，就痛得钻心，真有点伤脑筋。虽然如此，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来是怕主席看出来或知道了，他又要分心，二来心想，这点病算得什么，所以也就没吭声。

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我的头老是要向上仰着，脚步抬得高，迈得大，颇象有钱的阔佬那种“昂头阔步”的姿态。

主席一向善于观察细小的事物，我这不平常的姿态，他又最先发现了，便打趣地问：

“陈昌奉，你怎么啦？老望着天干什么，要防空吗？”

我望着头顶上垂下来的厚厚的树叶，回答说：“我们这里有两层天，敌人的飞机怎么有本事也找不到我们。”

“那么天空上是什么东西使你那么发生兴趣呢？”

我知道，主席只要发现了问题，就一定会弄得水落石出，瞞也瞞不过去，于是只好走到主席身旁说：“我的头得了个怪病儿，怎么也低不下来，脖子一轉就痛得厉害。”

主席听了我的话，立刻站住了。我怕他为这事担心，便接着说：“不要紧，一会儿会好的。”

主席象是没有听见我下面的话，赶忙走上前来用手轻轻地摸着我的脖子，又轉过身去喊卫生员：“鍾福昌！快来给陈昌奉看看！”

主席这一喊，大伙都围上来了。小曾和鍾永和对我这个病特别感兴趣，一会儿揪揪我的脖子，一会儿碰碰我的脑袋，气得我干着急没办法。

鍾福昌过来看了半天，然后笑嘻嘻地对主席说：“主席，他这号病儿我可不会治；那一定是晚上窝了脖子了。”

主席一听象是放下了心，可是接着又说：“这也不能

傳着。小曾，你到前边卫生部的队伍里去請傅連暉同志来給陈昌奉看看。”

沒等我說出“不用”，小曾就飞快地跑掉了。

由于我老仰着头不敢低下，主席怕我摔跤，就牽着我的手走路。我就象一个剛学走路的小娃娃，由父亲領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蹣跚着走去。

主席一边走一边安慰我說：“不要紧。”

傅連暉同志赶来了，他走到我面前，詳詳細細地問了我好一陣之后，就搬着我的头搖了一会儿，又給我抹上了一些药水。啊！真見效！不一会就好了。

当我能低下头来的时候，主席問我：“好了嗎？”我把头轉動了几下說：“好了！”主席又打趣了：“真有本事！为了睡覺，头也不要了！”

草地前后

走出露營的荒山野林，我們就到达了毛儿盖。在这里停下来准备过草地。

从过夹金山我就发瘧疾，过了夹金山已經好了。后来因为被雨淋了一场，又加上长途行軍的疲勞，不想在准备通过最艰苦的草地的时候，我又犯病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生病，不单单是个人的痛苦，全体战友都要为你着急、担心；特别是主席，在这里会談多得难以想象，他的身体更虛弱了，瘦瘦的身躯显得更加高大。有时深夜散会回来，不等休息就又和王稼祥等首长研究問題，有时一直

持續到天亮。而在这种繁忙的情况下，他还經常探望我的病；有时看我寂寞，就給我讲为什么过草地和一些有趣味的故事，鼓励我坚持着战胜草地。每在这种时候，我在这慈父般的愛撫下，一方面觉得无限地溫暖和感激；另一方面就痛恨自己：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病呢？增加同志們的負担，分散主席的精力。心里悶得不得了！一天，我偷偷地打开了鍾福昌的药包，偷出了十二片奎宁統統吃掉了。結果不但沒有把病弄好，反而把耳朵弄得嗡嗡直响，头也像是要炸开似地疼痛。

这时候，同志們每天都忙著出去割青稞麦子，回来炒熟磨成粉，准备过草地吃。可我只能呆在家里（主席不让我出去，非要我休息不可），心情很不好。

我們所住的地方是一座喇嘛庙，我就住在大殿里，四周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神仙”和我做伴，我閑得无聊，就一个个地給它們“相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些“神仙”們都是木头做的，体格很結实；而最令人奇怪的是，它們每个背后，屁股以上接近腰部那里，都有一个小洞洞，外面用一块木板堵着。我好奇地爬到一个大“神仙”背后，仔細地端詳着那个洞，沒怎么費力就把那块木板取了下来。这一下可就出来“玩意儿”了：“啪！”从里面掉下一个很小的紅口袋，随即就把洞口堵住了；等我把它拿了出来，洞口又被一个口袋堵住了。哈！这我可看出門道来了，掏一个，堵一个；掏一个，堵一个，一連掏出了好几个！打开一看，有芝麻，有大豆，有大米、小麦等各种各样的粗細杂

粮，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发现，给我的养病生活增加了很大的乐趣。从此，每当别人都外出筹粮的时候，我就原地不动地向“神仙”要粮。就这样，竟搞出了二、三十斤粮食，我很感激那些“神仙”们。我把这事透露给小曾和吴洁清等同志，他们又高兴又羡慕我的运气！这么一来，主席过草地的粮食，问题就不大了。可这件事，主席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这是违反群众纪律，主席晓得是不会答应的。

在毛儿盖住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中旬，我们从这里出发，向那块自古以来无人经过的大草地进军了。

离开毛儿盖四十多里地，碰上了一片有二十多里长的一望无边的大森林。林中的树木都十分高大，有的竟有两抱多粗。到了这里，同志们便把给主席搭的铺吊在大树干上。按照主席的习惯，白天到了宿营地，是从不休息的，不是开会，就是到部队里去。来到这里，主席早到前边去了，卫生员钟福昌同志便让我躺在主席的铺上休息。

天黑了。森林里燃起一堆堆的篝火。住在这古老森林里的飞禽走兽，恐怕从来没有见过火光，都被惊得乱飞，怪叫起来。这时候，同志们有的围着火堆，有的靠着大树都呼呼地睡熟了。我躺在铺上，病又来了，盖着主席的夹被，穿着主席在毛儿盖给我的一身新衣服（这是别人送给他的），身子还不停地颤抖。我坚持着不让自己发出一点

声息，免得惊醒了同志们，特别是怕惊醒卫生员鍾福昌同志，要是他一知道我的病又犯了，就会马上告诉主席，主席就不会睡他的铺了。我憋住气，把腿弯到小肚子上，一声不吭。忽然在我面前闪过一个高大的身影，是主席回来了！我挣扎着想把蜷缩着的双腿伸开，但它好像弯起的长弓，紧紧地贴在小肚子上，怎样也伸不开了；整个身子都不听我指挥了！只是不停地打着牙，发狂地颤抖着。主席走到铺跟前，弯下腰，轻轻地问我：

“怎么啦，陈昌奉？”当他的双手触到我哆嗦着的身體时，就喊道：“鍾福昌，陈昌奉又犯病了！”主席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叫醒了火堆周围所有的同志。他们都跑了过来。

鍾福昌同志第一个跑到我的跟前，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为难地说：“唉！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我知道他心里是在为没有及早地发现我犯病而难过。但我又怎么能要求一个比我还累的同志，牺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过来过多地照顾我呢？

当我看到主席和同志们站在我的面前，关切地注视着我，身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竟一下子坐了起来。

“躺下吧！”主席两手接着我的肩，柔和地说。

“躺下吧！”多么普通、平凡的三个字，但它是从主席的嘴里，从和我们一样长途行军作战，但革命担子又重于我们几十、几百……倍的主席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三个字的分量该有多重呵！

我掙扎着不躺，但主席那雙有力的大手把我降服了，我一點勁兒也沒有了。主席看着我躺下來，又讓鍾福昌同志給我吃過藥，和大家一起往火堆那邊走去。

烈火給寂靜的密林增加了生氣，烈火映着主席高大的身軀和圍在他身邊的同志們。我強支起身子想喊一句，“主席……”但病魔突然把我死死地摔在鋪上……

第二天早上醒來，不知是因為一夜休息的作用，還是主席慈父般的愛護所給予的力量，我一下子跳下鋪，跑到了主席的面前。

“好些了吧？”主席扶着我問。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淚水順着兩頰流了下來……

我們又開始前進了，古老的森林落在我們的後面。回頭望去，我們夜間燃着的火堆，火光還隱隱可見。

踏上草地，舉目四望，不見一棵樹木，茫茫一片荒涼，沒有人煙，沒有生氣。偶爾發現一、兩處小丘，就和陸地上的刺蓐一樣。那腐爛了的永遠浸在污水中的野草，無邊無際，踏在上面，發出使人厭倦的“卜唧”“卜唧”的响声；一不留神，就會雙腳深陷，甚至埋進這無底的泥潭中，在這種時候，要是沒有同志們的幫助，想拔出腿來勢比登天還難。有好幾次，我們陷在泥里，主席用他那巨大的手臂把我們拉了出來。

這裡的氣候相當寒冷，並且變化無常，一會兒落雨，一會兒下雪，有時還降下很大的冰雹。我們每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主席走在我們前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关切地呼喚着我們的名字，直到我們答应了，才轉过头去。有时，他見我們困乏了，就給我們讲故事、說笑話，往往引得大家呵呵大笑，这样一来，同志們所有的疲劳都被赶走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却听不到一声叹息，一句怨言，有的只是坚强的毅力和无比的信心。真的，有主席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永远都是乐观的！

部队也走进草地了，他們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灰色的軍装，有用各种兽皮做成的大衣；有身上披着毯子的，有头上戴着斗笠的；还有打着雨伞的，……真是形形色色，給这片死气沉沉的原始大草原增加了无限的生气。他們都相互拉着手，或集体握着一條长长的繩子，頑强地前进着。

有一天，突然发现草原的地平綫上隆起了一个黑点，越来越大，那是什么呢？还没有弄清楚，大家的心就兴奋得跳起来了。啊！有奔头了；那是一个叫“班佑”的地方！这时候，同志們那股欢乐的情緒，簡直无法形容。

到了班佑，主席和我們住在一間藏民的“牛屎房子”里（即用晒干的牛粪搭成的房子），大家兴奋地燃起牛粪，烤着潮湿发霉的衣服。

不久，我們到了巴西。在这里我們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四方面軍的一些同志，拖着沉重的脚步，沒精打彩地掉轉身向相反的方向——向那可怕的大草原走去。

起初，我們还不能一下子理解这种现象。都很惊奇，

就問主席：

“主席，他們為什麼往回走呢？”

主席沒有馬上答复我們。但从他的面色看，可以感覺出他是很激動的。我們明白了，這就是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黨的陰謀；他象驅使奴隸一樣地逼迫這些心地單純的同志向着毀滅的道路走去。

過了一會兒，主席反問我們：

“你們都願意向後退，再過那大草地嗎？”

“打死我們也不後退！”我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主席站起來，望着那些往回走的、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的同志們，沉重而有自信地說：“他們還會回來的！我們要在前面為他們打開一條路，好讓這些同志走過來！”

—— 六 盘 山 上

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們到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里。我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让他休息。到另一个屋子一看，主席正和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首长在谈话。桌子上摆满了地图。听说腊子口是甘肃、四川两省的“天险门户”，也是我們从这里到陕北比较重要的一关，我想主席一定在和其他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出来。一直快到深夜了，主席才回来休息。

果然，第二天拂晓，我們就打下了这天险的腊子口。我們沒有停留，经过腊子口，又繼續前进了。

九月下旬，我們又通过了渭水封鎖綫，向六盘山前进。

六盘山是隴山山脉的支峰，是隴西第一峻岭，也是我們到达陕北经过的最后一个高山。听说今天要过六盘山，大家都鼓足了劲。出发时，天上就布满了乌云，冷风一个劲地吹，不一会又下起雨来。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减弱我們翻过六盘山的决心，虽然来到山下时我們的衣服全淋湿了，但大家的劲头仍是很足的。

六盘山虽然不能和我们爬过的雪山相比，但站在山下仰望，也挺险要的。山上小路崎岖，刚上山时，还有小树可以攀登，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枯死的小草，因此走起来非常困难。

路过四川时，不知怎的我得了个肿腿的病，这几天腿虽然消了肿，但由于爬雪山过草地，特别是又染上疟疾，这样一折腾，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六盘山一上一下六十里，路又不好走，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得不行；心也象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一样嘣嘣直跳，冷汗一身紧接一身向外冒。主席很快便发现了我这种情形，因此每当走到难走的地方，他都伸出那有力的大手，把我拉上去。

快到山顶时，我是一步也挪不动了。只觉得头昏眼花，身体轻飘飘的，但腿却象绑上了几百斤重的东西一样拉不动，虽然我仍咬着牙，能走一步走一步，但仍被主席看出来。主席扶着我，亲切地问：

“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主席不问还好，一问，我立刻想到自己也许不能跟随主席到陕北了，不能再和主席在一起了。想到这里；鼻子一酸，便流出泪来，说：“主席，这座山恐怕我是过不去了！”刚说完，就觉得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接着便不由自主地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昏昏迷迷的觉得有两只大手拦腰把我抱住，紧接着又听到主席那慈祥的声音，象是对小曾说：“快叫鍾福昌拿药来，他的疟疾又犯了！”不大一会，又觉得象有人往我

嘴里塞进了两粒有苦味的东西，还灌了一口水。我渐渐清醒过来了，定睛一看是主席在扶着我，小曾、鍾福昌同志都站在周围。一看到主席，心里又难过起来，我说：“主席，我不是犯了瘧疾，是沒力气了，怕到不了陕北了！”

“你能到陕北的，一定能！不要怕。”主席鼓励着我，“困难不可怕，就怕你怕它。你怕它，它就可怕；你不怕它，它一点也不可怕。坚持一下，翻过这座山就好啦！”

听了主席的话，对翻过六盘山的信心增强了。为了不連累主席，于是我说：“主席，你先走吧，我休息一会就走！”

“不行！”主席坚持说：“这里空气稀薄，又直下雨，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说着和小曾架着我就走。我见主席这样关心我，也很想快点走，誰知浑身上下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动，干着急没办法。

主席问我：“你是不是冷呀？”

我说：“冷，骨头缝里都发冷！”

主席又说：“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说着，就要脱大衣。

我知道，主席要是脱下皮大衣，他身上只剩下在遵义时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况且昨天晚上他一直忙到很晚才睡觉，今天又冒雨行军，我不但没有照顾好主席，又給主席增添了許多麻煩，現在又怎能再穿他的皮大衣呢？我一把抓住主席的手，说：“不，我不穿，我能走！”我坚持着不穿，掙扎着想自己走，但終因身体太弱，

剛一迈步，就又昏倒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一眼便看到我身上已經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雨中，秋風吹動着他那單薄的灰色軍衣；那還沒有完全消失担忧的臉上，已露出了一絲喜悅的笑容。小曾同志端着一碗水，也站在旁邊。看到這一切，我全身立刻感到一陣熱，不知從哪兒來的一股力量，我忽地一下站了起來，呆呆地望着主席，喉嚨里象被什麼東西塞住了一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

主席見我站了起來，高興地笑着問我：“好了點嗎？”

“好了，走吧！”我滿肚子的話，就是說不出來，用力才說出這四個字。

“好樣的，這才是紅軍戰士。走！”主席親切地拍着我的肩膀。

傍晚的時候，我們終於翻過了六盤山，來到山下。當我回首仰望六盤山時，主席又一次親切地對我說：“這不是過來了嗎？對待困難就應該這樣。”

晚上，我們宿營在六盤山下的一個小莊子里。我躺在鋪上，白天發生的事，都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心里自言自語地說：“要是沒有主席的愛護和鼓勵，我今天恐怕要犧牲在六盤山上了。”想着想着，眼淚又潤湿了眼眶。我自己囑咐自己：“一定要記住主席的話，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都要記住，牢牢地記住。”

一二 我們到了家了！

翻过了六盘山，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

甘肃回族区的回族人民，对紅軍十分热情；我們每到一处，他們都夹道欢迎。有的提着水壶、擎着水碗對我們說：“同志們，今天从哪里来？辛苦了，快喝点水吧！”从进入藏民区連汉语都很少听到的我們，今天听到“同志們”三个字，覺得无比的亲切。回族兄弟告訴我們，今年七月紅二十五軍曾到过这里。从他們的語調中，我們知道，紅二十五軍的同志們用严明的紅軍紀律，給回族人民种下了对紅軍的良好印象。

进入这一带，离陕北越来越近了！大家情緒都很高昂，所有的疲乏、劳累以及病痛都好像长了翅膀，一下子全飞沒了。大家恨不得一步迈出甘肃，踏上陕北的土地——看一看这个朝夕想念着的“家”。

一天，我們从甘肃环县出发，走出了几十里地，登上了一座光秃秃的小石头山。剛停下脚，就发现山下小路上，由远而近地跑过来五匹馬，騎在馬上的人，胸前都插着短枪，头上包着白毛巾，身上穿着便服，看模样都是二十几岁左右的小伙子，挺神气的。他們到了山下，把馬拴

在那里，直向山頂跑來，并大聲訊問一些同志：“毛主席在哪裏？”

我趕忙迎了上去，問道：“你們是干什么的？”

他們跑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其中一個年歲較大的熱情地說：“我們是老劉派來給毛主席送信的。毛主席在哪裏？”（“哪裏”兩個字，我還是頭一次聽到呢！）

“老劉！”老劉不就是劉志丹同志嗎？我說：“同志，你們是劉志丹同志派來的啊！”

“是的，是的，”他們五個齊聲回答。

那個年歲較大的把信拿了出來，我拿着向主席走去。

他們五個站在一邊，看見我把信交給了主席，很小聲地問我：“這就是主席？”

主席看完了信，立刻笑着對他們說：“同志！你們辛苦了。”

這一來，他們全明白了，這就是他們和陝北的老百姓盼望已久的毛主席呵！

他們都笑了，臉也興奮地漲紅了，一齊擁到主席跟前，爭着和主席握手。

這時，山上、山下集中了不少的部隊臨時在那里休息。毛主席走了過去，站在同志們中間，大聲地講：“同志們！我們就要到達陝北蘇區了！我們的二十五軍和二十六軍派人來接我們了！他們勝利地打退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成千上万的同志们听到主席发布了这一个大喜讯，都像喝醉了酒，笑着、叫着、跳着、互相搂抱着，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种激动的场面！几只雄鹰也在我们头上盘旋，大叫，参加了我们欢乐的队伍。

前来的五位同志，变成了我们的向导。他们领我们到了一个名叫三岔镇的村子。当晚，主席和这几位同志谈了很长时间，又给他们写了信，连饭都没顾上吃。

第二天我们宿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这里没有大米，尽是金黄黄的小米。我们这几个警卫员都是南方人，不但不会做小米饭，而且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新鲜玩意儿哪！有句成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我们这一帮人，倒是“拙夫难为有米之炊”了！怎么办呢？那里的羊很多，我们只好买了一只大羊杀了，煮了煮当饭。

等主席回来，我和小曾抬着一条羊腿送到主席屋里。

主席看着我们俩，奇怪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光吃肉！”

小曾抢先说：“这里没有大米，也买不到面，有的尽是小米，我们做不来。”

主席说：“那很好办！要学嘛，到了新的地区，就要学会新的地区的生活习惯！要不，我们就会饿死的。”我们听了，想立刻动手学习做小米饭去，可主席又拦着说：“算了。这一顿就光吃羊肉吧。”

我们从曲脂出发，到了甘肃、陕西边界的分水岭。这八十里地的路程，竟和马鸿逵打了十七、八仗。马鸿逵的

騎兵被我們一打就跑。同志們都嘲笑地說：“馬鴻逵的騎兵，連貴州王家烈的‘豆腐隊伍’都不如，是些‘豆腐渣’。”

主席對我們幽默地說：“靠我們中國工农紅軍這個响亮的名字，他哪敢打！他們的本事就是跑。”

分水嶺的山頂上有一塊高大的界碑，作為甘肅、陝西兩省的分界綫。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嶺”三個大字，碑旁邊有野栗子樹，我們就坐在那里休息。

主席一面看石碑後邊的文字，一面興奮地對我們說：“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啦！”

過了分水嶺，又走了一天半，我們便到达了吳起鎮。我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并且住上了窑洞。这里已經是我們蘇維埃的土地了。

來到这里，主席便忙着和林彪、陳賡等首长研究打騎兵的事。

部队的同志听说要打馬鴻逵的騎兵，情緒都很高。他們說：“到了家了！要打个胜仗做为礼物，送給陝北的人民！”

在打騎兵的那天，我們跟着主席站在一个山頭上。那里的山峰像剃得光光的和尚头一样，几乎沒有一棵樹木、一巴掌草地！战斗开始了，我們的机枪哇哇地响了起来，只見那許多失去指揮的、受惊的馬群，在山中間乱跑乱窜，怪声地嘶叫着。我們的火力很密集，就是千里馬也

逃不过那像雨一样的“嗖！”“嗖！”的子彈。我們看得很清楚：敌人的騎兵从惊吓乱窜的馬背上翻滾下来，有的連人帶馬从山坡滾到山下……。这一下，他們可是吃尽苦头了，沒有坚持多久，就慌忙逃窜了。

我們看得真过瘾，跑到主席面前說：“主席，我們两条腿的，竟把四条腿的追赶得滿山乱跑！”

主席也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吳起鎮，部队住下休息，我們就跟随主席到当时陕甘地区省委和省苏維埃所在地夏师灣去。

當我們踏上行途的时候，天空紛紛地飄落着鵝毛大雪。

我們披着雪花，步行在崎嶇不平的山間。虽然身上还穿着单衣，可一点也不觉得冷。

接近夏师灣已是黄昏，遍地白雪映着夕阳，倒象日出之前一样。還沒进村，就听得前面鑼鼓喧天、人声嘈杂。远远望去，在夏师灣村头的一块大平地上，挤滿了等候迎接主席的人群。他們看到主席来了，都狂呼起来，鑼鼓敲得更响，雪也下得更大，好象是万人的喊声和震天的鑼鼓声催下来的一样。人象潮水般地向主席这边涌来。他們手里都拿着紅綠小旗，上面写着：

欢迎毛主席！

迎接中央紅軍！

扩大陕甘宁苏区！

粉碎敌人“第三次圍剿”！

中国共产党万岁！

.....

主席穿着那件从江西带出来的、已经破了的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很旧的帽子，和欢迎的人群频频点头招手。

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和卫生员、担架员、饲养员互相抱起来，在深雪里跳着、叫着，享受着胜利的欢乐！雪是不是还在下，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了。

这时，欢迎的群众让开了一条路，有数十位首长模样的同志跑过来热烈、激动地和主席握手。他们就是：刘志丹、刘景范（刘志丹同志之弟）、马明方（当时陕北的省苏维埃主席）、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军长）等首长。这时和主席站在一起的，还有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王稼祥同志、徐老、林老、董老、谢老等诸位首长。他们也和前来迎接的人一一握手，并且互相介绍着。

风雪越来越大，并且发出大声的吼叫，但欢迎人群此起彼伏的高呼、狂呼，震撼了大地，压倒了一切！

“我们胜利了！”我和小曾也喊了起来。

一三 主席送我入学

到达陕北之后，环境安定了。各种組織慢慢地建立了起来；生活、工作逐步納入正軌了。

一九三六年春，一天，紅軍大學的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同志来主席这里，談起“紅大”招收學員的事情。談到中間，主席看了我一眼，又沉思了一会儿，說：

“我們總部有一些老兵，他們都是經過長征考驗過的好同志，把他們送到你那里學習好嗎？”

莫文驊同志点点头，連聲說：“歡迎！歡迎！”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给主席打过洗臉水后，正要走，主席忽然叫住我說：“陳昌奉，送你到紅軍大學去學習，你高興嗎？”

我沒有馬上回答，心突突地跳了起來，各種各樣的想法，一齊湧到心頭。我，一個沒有讀過書的、自小給地主放牛的人，主席居然送我上學，這能不高興嗎！可是，我跟隨主席五、六年了——這是一個不算短的時間呵！在那些最艱苦的日子里，主席無論怎樣繁忙，從不放棄隨時隨地教導我、關心我；從我的政治、思想、文化學習，一直到最細小的生活。我在他的那種慈父般的關照下，在他

的偉大思想的影响下，我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我懂得了階級斗争的真理，学到了許多知識；而且最重要的，我从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作风中，直接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一切，永远印在我的心上，刻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我要去学习，要离开主席了，唉！我怎么能离开他呢？

主席见我沉思不语，又问了一句：

“想通了吧？”

“我，我还是不去吧？主席！”

“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就是不願离开你！……再说，跟着你还不是一样地学习嗎？”

主席走到我的面前，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然后又让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温和地说：

“陈昌奉，你应该懂得，我們的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了，各种工作都需要干部；需要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你跟我五、六年了，沒有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现在应该到学校去有系统地学习学习了。学习好了以后，出来为党更好的工作，我也很高兴，你說对嗎？”

主席慈祥的眼睛，一直看着我。

“可是，我走了，你的生活怎么办？”我孩子气地说。

主席笑了，说：

“那沒有問題。你走了，組織上会派別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的。你知道吗？少奇同志的警卫員也要去学习

哪！”

我站了起来，一种激动的情绪使我端着脸盆就往外走，直到眼泪滴到盆里的时候，才发现主席还没有洗脸，盆里的水还干干净净的呢！

我去学习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临离开主席的前一夜，我翻来复去地不能入睡。想着主席说的学习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学习，自己心里也明白，但又想到马上就要离开主席……我离开他，派谁来接替我的工作呢？新来的同志一下是不会熟悉主席的各种生活习惯的，能照顾好主席吗？想到这里，心里矛盾得很，我轻轻地从床上跳下来，走出门去。夜已经很深了，主席的办公室里灯光还亮着，我想进去，向主席再作最后一次要求，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但当我走近他的窗前，看见主席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写东西的时候，我的勇气没有了。我知道，只要我推门进去，主席一定会和我谈谈的，可是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我不能进去，我不能打断他的工作！难道能为我这点事情，妨碍他为整个国家、整个党所进行的重大工作吗？于是，我又轻轻地回到自己的宿舍来了。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洗过脸就去主席办公室，象往常一样，我一件一件地擦洗和安置那些办公用具。这些东西，我是多么熟悉呵！——墨盒、毛笔和我裁开的纸张……，它们都要和我分别了！过了一会儿，主席进来了，他手里拿着几个本子和几支铅笔，走到我面前说：

“你要走了，不要收拾了，休息一下把！”說着，把手里拿的两个报纸本子和两支黄杆“长城牌”的铅笔交给了我，一面說：“这是給你学习用的。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休息的时间，就到我这里来玩。”

我接过东西，呆呆地望着主席，沒能說出話来，只觉得喉嚨有什么东西堵塞着，眼泪快要涌上来了！

我入了紅軍大学不久，主席就到前綫去了。

我在紅軍大学总共学习了四十天就調出到西北保卫局保卫队当指导員。

同年八月間，主席从山西前綫回来，我去看他。一进门，主席就問我：“学习得怎样了？”

“不学习了，已經工作了。”我說。

“什么工作呀？”主席点燃一支烟，很有兴趣地問我。

“在西北保卫局保卫队当指导員。”

“好嘛！带多少兵呀？”

“有二百多人呢！”

主席听罢望着我，有点逗笑地說：“二百多人，是个小小的营长了嘛！”（那时我們有些連队只有七、八十个人。）

主席的話說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停了一会儿，主席又問我：“工作怎么样呀？当指导員了，会立正、稍息了嗎？”（我們过去跟主席的时候，連立正、稍息都作不好，主席經常說我們。）

我知道主席想起了我以往的情况，不由得笑着答道：“现在可是会了，但就是不会讲话，特别是晚上点名……”

主席立刻笑着問：“战士們跺脚嗎？說有蚊子嗎？”（那时候有些調皮的战士，每当晚上点名时，要是講話的讲长了，他們就在队里跺脚。你要問他怎么搞的，他就說是蚊子咬的。可見主席了解战士們的特点比我們还清楚呢！）

主席的話，把我引得笑了起来。

主席接着又說：“当干部了，各方面都要注意。講話的时候，讲明白了就可以了，不要罗嗦，不要装腔作势。”又問：“战士們学文化嗎？”

“学。”我說。

“誰教他們哪？”

我有点难为情地說：“我。”

主席瞅着我笑着說：“你呀！那么几个字，怎么教別人哪！”

我說：“我一边学，一边教；有不識的字，就請教《学生小字典》。”

主席听了，立刻鼓励我說：“这就很好了！要克服困难。你还記得我們在江西的时候，謝老、徐老，还有陈云、左权等同志，怎么样教你們认字嗎？”

我点了点头。那怎么能忘呢？在江西的时候，一住下来，首长們就輪流給我們上課，教我們认字。特别是謝老，他對我們的文化学习特別关心，一有空儿就教我們；我們有不認識的字，多半是找他。就說主席，他的工作那么忙，可一得便，就想出各种办法督促我們学习。那时紅

軍每到一個地方就貼標語，主席就利用行軍、開會的空隙指着標語教我們識字。在這個地方教了，到另一個地方就考我們。我學會寫自己的名字，還是主席親手教的哪！主席不只教我們認字，還教給我們各種知識，記得我們住在福建龍岩（出煤的地方）時，主席就給我們講解地底下為什麼會出煤；到了有溫泉的地方，主席就告訴我們地下怎麼會冒出熱水；到了打雷、閃電的時候，他又給我們談些關於氣象變化方面的知識。記得在瑞金的時候，主席每月有九毛錢的菜金（和我們一樣），主席沒有專用炊事員，做飯做菜就是我和吳浩清。我們倆輪流着給主席買菜。我每次買回來，就把菜名記在文化課本上。

有一天，主席檢查我的文化課本，發現上面盡記了些大蒜、豆腐之類的菜名，便很有興趣地問我：

“陳昌奉，你这是記的賬嗎？”

我說：“不是賬，是學習的字。”

主席說：“這個辦法很好呀！吳浩清也記嗎？”

我說：“他不記。”

“那怎麼行呢！”主席嚴肅地說，“你把他叫來！”

我把吳浩清找來，主席對他說：“吳浩清，以後每天買菜回來要記上賬，還要向我報賬！”

從這時起，吳浩清才慢慢地開始寫字、認字了。

主席就是這樣的關心我們的学习。

主席和我說話之間，少奇同志、周副主席、鄧發同志、王稼祥同志等都來了。我見首長們來了，便想起身回去，

主席定要留我吃飯。飯后又玩了一会才回去。

进了我們保卫队宿舍的院子，只見几个战士在灯下談天，我推門进去問：“你們怎么不学习？”

“你不在家！”

我說：“从今天起，我們要严格学习制度。沒事一定学习，不能光玩！”随后我又提高了声調說：“毛主席很关心我們的学习哪！”

一四 辞別主席到前綫去

抗日胜利后，党要派大批的干部到新区和敌后去工作，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我們知道，日寇投降后許多新区的人民在等待着我們。

那时，我是延安公安局东关分局的局长。

一天，接到中央組織部通知，要我去談工作。去后，組織部的王鶴寿同志告訴我，党准备派我到前綫去，并提出山东、东北两地，让我选择。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重要的一条是听党的話，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因此，我表示由組織决定。

最后，党决定我到山东去。

那时，我对調动工作已經很习惯了，可这一次有点不同，心情上掀起了很大的波瀾——要离开主席了！从此以后，离开了延安，到了遥远的前綫，再不容易看到主席的慈顏了！

从組織部出来，太阳已經落了山。环抱着延安的山川，睡在靜靜的黑夜里。我一想到要离开这光荣的城市，脚步不自觉地緩慢起来；一想到要离开敬愛的主席，心突然猛跳起来，脚步又不自觉地加快了。回到家，我什么也沒顾

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看看主席——再看他老人家一眼呵！于是我拿起了电话，接到主席那里；那边答话的是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同志，我请他代我向主席致意，说我要到前线去，临行前渴望看看主席。贺清华同志弄清了我的意思，立刻放下电话，过了不大一会儿就给我回话说：“主席请你明天上午来。”

只这么一句话，可是它给我当时那种渴望、期待的心境多大的欢乐和鼓舞呵！

那一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着，心里又兴奋，又激动。我和我的爱人谈了好多话；谈我的过去，谈我在主席身边的那些情景；谈主席对我那些数不尽的教导、爱护……；谈主席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对党、对人民那种伟大的忠心耿耿的精神……谈得很多，就这样一直谈到天亮。

吃完早饭，我就和我的爱人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往主席住的地方——王家坪走去。

到了王家坪，贺清华同志在门口迎接了我们。他热情地说：

“主席一早就在办公室等你们哪！”

我们兴奋地跟着贺清华同志走进院子，江青同志迎了上来，她十分热情地和我及我的爱人握手，并随即把我们的孩子接了过去。

主席出来了，他穿着一身肥大的中山服，比前胖了一些。我赶忙走上前去打了个敬礼，主席亲切地把我们让

到他的会客室里。

坐了下来，主席就关切地问我：

“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我告诉主席到山东去。

“那要离开陕北了！有什么困难没有？”主席说。

我说没有什么困难。

主席又问我，爱人和小孩是否也一同走，路上有无困难等，我回答后，又嘱咐我好好关照她们。

接着，主席站了起来，走到我爱人面前问她：

“陈昌奉对你怎么样？你们俩感情好吗？”

我爱人有些不大自然地说：“很好。”

“你们互相帮助吗？”主席又问。

我和我爱人都笑着点点头。

谈了一会儿，主席又逗着我们的孩子，一面问我们关于小孩的一些情况。

后来主席坐了下来，谈到我去山东的问题，他说，到了新地区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要想办法克服。并再三嘱咐我，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说着话的时候，他让贺清华同志拿来了两包自制的饼干和一些牛肉干递给我说：“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你们，这点东西留着给孩子路上吃。”

这个时候，我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小本子，对主席说：“主席，我要离开您了，您给我写几个字吧？”

主席立刻让贺清华同志拿来了墨盒、毛笔，在本子上

留了如下的題字：

賀同志
努力作，忠實於黨，
忠實於人民！祝你
勝利。
賀
2005年
明

寫好之後，他又拿出一張他自己的照片送給我。

我們事前听賀清華同志說，主席十點半有會，所以到了那個時間我們就站了起來。

主席說：“不要忙，我去開會，你們在這裡玩，在這裡吃過飯再走！”一面就對賀清華同志說：“把他們留下來吃飯！讓陳昌奉自己挑几樣菜！”

我們對主席說，因為行期已近，急着回去做些準備，不在這裡吃飯了。

主席看我們執意要走，也就沒有再強留。他親自送我們到門口，并一再囑咐我們要好好地工作，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當主席伸出手來和我們握別的時候，我緊緊地握着

他的手，一句話也沒能說出來！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我離開了延安。多年來，不論是在烽火連天的前綫，也不論是在和平的建設生活中，我都覺得主席和我在一起；一想到他，我就有了更大的力量，有了更大的信心。他送給我的照片和在小本子上的題字，至今還保存在我的身邊。我將永遠遵照主席的諄諄告誡，努力工作，忠實於黨，忠實於人民！